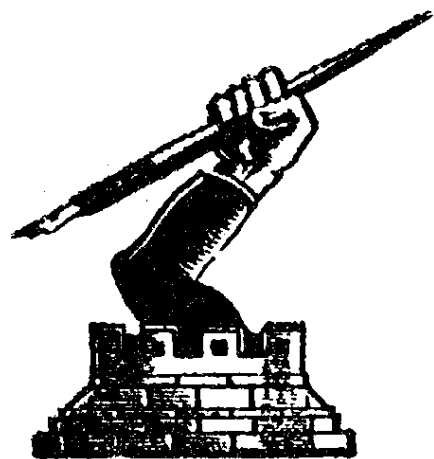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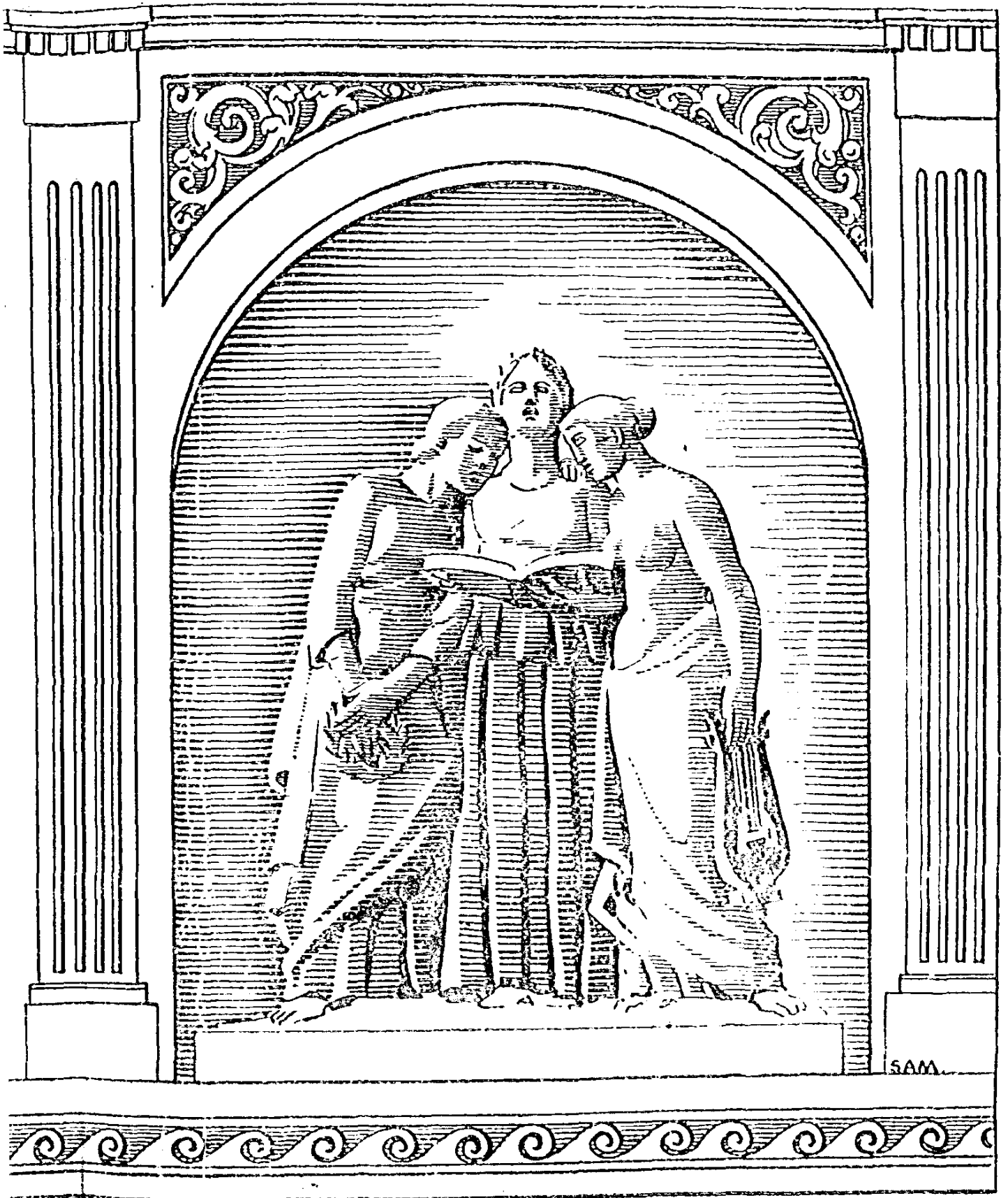
究研原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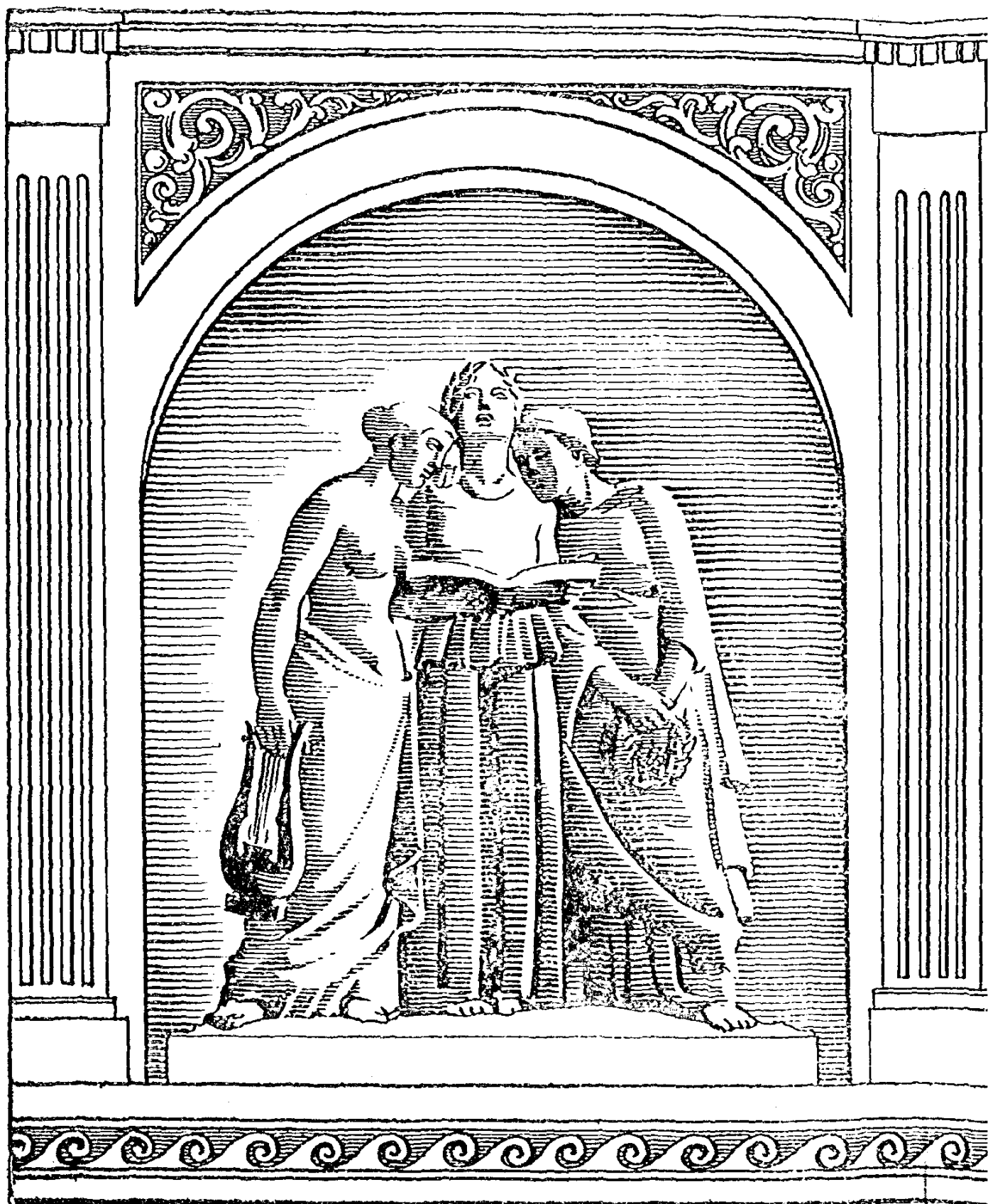
著 若 沫 郭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行 發 總 司 公 資 投 化 文 國 中







樂文若珠

家
家
家

第 一 輯 三 冊

珠

若

文
集

第 一 輯

第 一 冊



3 0661 0 5

782.818
321-636-2

192

集文若沫

究研原屈

册三第辑一第

社版出盖考

1946



3 0661 7270 5

目次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一——八〇
二 屈原時代	八一——一〇四
三 屈原思想	一〇五——一四八
四 離騷今譯	一四九——一九四
五 跋	一九五——一九六

屈原研究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一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要推數屈原。他是生在戰國後半期的楚國的。司馬遷的史記上有一篇屈原賈生列傳，前半部便是傳的屈原。我現在把那大要摘錄在下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記，明於志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原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

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

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這便是屈原傳的大略。在傳的最後司馬遷還有幾句評論是：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

垂涕，想見其爲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因爲他把天問、招魂、哀郢諸篇，和離騷一樣，都認爲是屈

原的作品。

自從有了司馬遷這篇評傳之後，兩千年來討論屈原的人大都奉以爲規臬。從沒有人

懷疑過。但在近幾年來却是大大的發生了問題，竟連屈原的存在都有人要加以否認了。這個問題雖然是新發生出來的，但既有問題發生，如在未能解決之前，又來肯定着對於屈原要作進一步的研究，那等於是在砂上築臺，全部的努力會有成爲空費的危險，所以我在這兒要多費一點筆墨來討論這個問題，看看懷疑的人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否充分，而屈原這個人究竟是否存在。提出了這個問題的人，第一個是四川的廖季平先生，據謝无量先生的楚詞新論上說：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說「屈原並沒有這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着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他以為詩經本是天學，所講的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詞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

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遊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秦皇二十六年）……」
廖先生的楚詞新解我還沒曾看見過，他的詳細的論證我自然無從知道，但在這個簡單的轉述中他的主張的要點是揭示出的。

其次是胡適之先生的讀楚詞，對於屈原傳也表示過同樣的態度。他說：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過問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傳尤其不可靠。（子）傳末（案在賈生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

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會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唯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半稱屈平，後半稱屈原，五大可疑。」

胡先生的文章我因爲手頭無書也還沒有窺到他的全豹，這一段也是由楚詞新論所轉

錄下來的。他所揭出的疑問的確是很直得令人懷疑，我想廖先生以爲屈原傳不可靠，大約也就是根據的這些疑竇吧。

這兩位先生的懷疑是應該首先解決的，我們應該來當一個公正的審判官，要看是司馬遷可靠，還是廖胡兩位先生可靠。

廖胡兩位先生，特別是胡先生，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是犀利，但過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不能成立。（子）項所列的那一段話，早就有人說過是『後人所增』註一而那增竄過的文字也還有傳譌，『孝文崩』，應該是『孝景崩』的錯誤。（丑）項的五大可疑也疑得不甚周到。第一層的既疏了，既不在位了，而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我們如想到現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發杼偉論的近事，便可以不費筆墨地得到了解。第二層的『放流』兩個字當成流謫解，是後來的人講錯了的。其實『放流』就等於『放浪』，並不是說屈原在楚懷王時便遭過流刑。第三層的『秦虎狼之國不可信』的那兩句話，本來是很平常的話，昭睢可以說，屈原也可以說，就如現在的『打

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樣，那是毫不足怪的。但關於這一層更有人說昭睢就是屈原的。楚詞新論上引劉申叔的話說：

『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說屈原諫懷王及使齊的話，戰國策都作昭睢，無屈原名字。恐怕昭睢就是屈原。古音本通。』

這個見解的根據是太爲薄弱。莊子的庚桑楚篇上說：『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所說的就是楚國的『三閭』屈、景、昭。甲氏就是屈氏，說它是音變固可以，註二說它是字誤也未嘗不可以。據此可見得昭屈原本是三氏，昭是楚昭王的支庶，註三所以說是『著戴』，戴是代的假借。屈是楚武王的兒子屈瑕所封的采邑，註四所以說是『著封』。三者是完全不同的。莊子的齊物論中有善鼓琴的昭氏，其名爲文，註五還有他的兒子也是承繼着父業的，可見昭氏並不是沒有流傳。總之昭睢不能說就是屈原。他與屈原同時而且大約是同志，所以他們說話相同。使齊時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隨員，也是說得過去的。

至於第三大疑問中言屈原傳中所有的事爲張儀傳所無，這是司馬遷慣用的詳略互見的筆法也毫不足怪。第四大疑問的黔中和漢中是胡先生太着急，把原書看脫了一半。張儀傳上是說『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頃襄王二十二年才爲秦所取。『武關外』便是指的漢中。三篇文章並沒有衝突。只是張儀傳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實，後來楚也沒有給他，不用說武關外的漢中也是沒有到楚國手裏的。第五大疑問的前稱屈平後稱屈原更不能成爲疑問，因爲『屈原者名平』，司馬遷在開首的一句就交代清楚了，稱平稱原本是兩可。前半有『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也明明稱的是原。而且『高平曰原』見爾雅，『上平曰原』見公羊昭元年傳，名平字原也是很合乎古訓的，不能夠說司馬遷是誤把兩個人合成了一個人。

據上所述可見胡先生對於屈原傳所發出的疑問均不能成其爲疑問，更推到廖先生所懷的疑問大約也不過如此。若要更進一步，疑及屈原這個人的存在，那就未免飛躍了。本來屈原和現在已經相隔了二千多年，所有實質上的物證都是消滅了的，假定他的屍首

被撈出而埋葬，將來有那樣的幸運把他的墳墓發掘了——傳說秭歸縣的屈沱有屈原的衣冠冢，但這是不可信的，只是後代的人所假託的東西——能夠得到多數地底的證據，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但在目前仍然是只好信憑着和屈原相去不遠的人們的著述。司馬遷並不是對於屈原關心的第一個人，在他之前有長沙王的太傅賈誼和建都在楚末的舊都壽縣的淮南王劉安。賈誼有弔屈原的賦，收在屈原傳裏面。賦體既仿效楚辭，且多摹擬離騷的辭句，而賦中又明明說：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屈原在賈誼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賈誼離屈原僅百餘年，所寄寓的地方又是長沙，曾經親眼見過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關於屈原的遺說不用說是還十分的新鮮。淮南王劉安是做過離騷傳的，註六那篇傳雖然失傳，但在屈原傳中還保存有一部份——便是『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那一節。註七

淮南王既住在楚的舊都，他的門下又有不少的文人學士，關於離騷的來歷，他也必然是有所根據的。

還有楚辭裏的卜居、漁父兩篇雖由近人的研究判定了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但那一定是屈原的後輩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兩篇都寄托於屈原，那也剛好證明屈原是確有其人。

有了賈誼和劉安以及做卜居、漁父的作者楚人在前，屈原傳在細節上縱使有疏失和爲後人所竄改的地方，而在大體上是不能推倒的。更何況屈原之存在與否和屈原傳的可靠不可靠也沒有必然的關係，譬如從前的人說地球是方的，那自然是不可靠，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懷疑地球不存在。問題倒還是應該更進一步來討論離騷或其他認爲是屈原作品的幾篇究竟是不是屈原所作。

廖先生所說的『詩經本是天學』，『楚詞是詩經的旁支』，那些話可以說完全是亂說，楚詞和詩經的相關在下章中還有討論的機會，在這兒暫且不提。但他疑離騷是秦傳

士的作品，却有他的相當的根據。在上面所揭出的他的證據之外，我也可以替他想出兩個證據。一個是『名余曰正則』的一句很像是在暗射呂政，這個證據在廖先生的著作中想來一定是有的，但秦始皇諱避政字，連正月都要改成『端月』，註八那有他的臣下做詩敢於直用正字？又一個是離騷的文辭主於以六字爲句，和秦的數尚六頗相符，但這也好說是偶然的現象。秦始皇時所做的一些有名的韻文，如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海上議、之罘東觀銘、之罘西觀銘、刻碣石辭、會稽刻石註九、嶧山刻石註一〇等，却都是以四字爲句。事實上秦人所做的文字都是很質實的，如詩經上的秦風，秦襄公時的石鼓文，註一一與同這些刻石辭，和楚辭的氣韻格調完全不同，那是和民族的氣質與地理的風土有關，無論怎麼是不能扯在一道的。只有楚辭中的大招一篇，舊以爲是屈原所作或景差所作的，要認爲是秦人的文章倒還可以說得過去。那篇是摹倣招魂，但僅貌合而神離，不惟決不是屈原所作，而且還不會是景差或楚人所作；因爲那裏面有『自恣荆楚安以定只』的一句話，荆是楚以外的人對於楚國的惡名，楚人自己是絕沒有稱過荆的。而

那裏面又有『直嬴在位近禹麀只』的一句，『嬴』我怕就是秦姓的嬴。不過那裏面有好些『政』字，又有『正』字，犯了秦始皇的諱，或者怕因為是私家著述，不是公文，所以沒有十分講究吧。總之除掉這大招而外，廖先生的新穎的見解是完全說不過去的，至於關於高陽的一節，王逸的註已經說得很明白，楚人的傳說也是以顓頊為祖先的，不限於秦。在古代傳說中，嬴與芊兩姓是共祖。

不過在離騷裏面也還有一個疑問，便是那『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的兩句，要說是屈原自述其名號，何以他不說名平字原？舊時的人有以為這是屈原的小名和小字的註一二，我看這種解說也未免吃力。在我的意思，以為正則和靈均是屈原的化名，文學作品慣用化名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屈原在我們中國要算是最先發明了這個例子的。

屈原不僅是存在，而且很幸運的是他的生卒的年月日都是明瞭的，這要算是古人中的僅有的一例。

他的生卒年月日見於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於太歲在寅

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據呂氏春秋序意篇言：『維秦八年歲在涖灘』，知道西紀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數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八年）該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註一三沒有庚寅的一天。我看這是因為歲星在事實上超了一次辰。歲星是每八二·六年超辰一次的，在那期間中超了一次辰，寅年便當得是前三四〇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與離騷相合。

至於他的死年是西紀前二七八年的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死的月日據傳說是五月五日。關於他這死年我在下章的論哀郢的一節中要詳細討論，在此我只揭出我所得到的結論：屈原是活上了六十二歲的人。

由上可知屈原的生是上距孔子卒（前四七九年）一三九年，下距秦始皇兼并天下（前二二一年）五七年，他是生存於戰國時代（前四六三——二二一年）的後半期，是中國的統一快要完成的時代，也是中國的文化最爲燦爛的時代。他的同時代的學者，比他稍前的有商鞅、申不害、瓊淵、接輿、尸佼、宋鈞、孟軻、惠施、莊周、田駢、慎到、

陳良、許行，比他稍後的有鄒衍、公孫龍、荀况、韓非，整整同時的政治家和他並且有特別的關係的有蘇秦、張儀。他的時代的確是羣星麗天的時代，而他在這個時代中尤其是有異彩的一等的明星。因為其他的人大概都是在理智方面發展的散文家，而他自己雖然也是一位政治家，但同時是在感情方面發展的純粹的詩人。秦以前的詩人有詩集存在於世的就只有他一個。

他的同時代人中如環淵、陳良、許行是楚人，莊周是宋人，但和楚的關係很密切，這些人在他的思想和文藝上有怎樣的關係，我要留在下邊去討論。

屈原的家世却不甚詳細。據漁父知道他是三閭大夫，便是楚國的貴族屈、景、昭三氏之一，史記說他和楚同姓，那是不可推動的。他的父親據離騷上說來是伯庸。那定然是號。古時候子孫稱父祖的字號是常事，金文中這個例子是屢見不鮮的。但準、則、與、靈均為化名之例，伯庸是不也就是化名却很難說。不過他的先世是有過功勞的人，惜往日上說：

「惜往日之會信兮，

受命詔以昭詩。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這是很明白的。第二句的意義，王逸說，是「君告屈原明典文」，又說「詩一作時」，但照屈原的執掌上看來當以詩爲正確，詩與辭通，屈原傳上所說的「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就是這一節的註脚。

他爲楚懷王左徒在懷王十六年許秦絕齊之前，是他三十二歲以前的事，但究竟是那一年就職，那一年去職，却無可考。「左徒」的官職在令尹之下，頗不低賤，看楚世家說「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便可以知道。

離騷又有「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的一節，說文「嬃，女字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段玉裁註云「王逸、袁山松、鄧道元皆言女

妻屈原之姊，惟鄭（玄）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須」，詩正義所引如此」。據此可知對於「女須」有二說，或以爲姊，或以爲妹。但須又有妾義，易歸妹「歸妹以須」，陸德明釋文引陸註「須妾也」，須卽須的省略。朱熹的楚辭集解也以須爲「賤妾之稱」，但他又說以「比黨人」，解嬋媛爲「妖態」，那却不免是道學家的見解了。據我看來，女須不應該是屈原的姊或妹。因爲離騷是屈原晚年六十二歲的作品（說詳後），在那時候不應該還有老姊和老妹陪着他過竄逐的生活，而且做老姊老妹的人也不好那樣「中中」地去罵他。女須可以解爲屈原的侍女，嬋媛爲其名。九歌的湘夫人歌裏面，有「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正可以爲互證。又把女須解爲天上的星名「須女」者，似乎也可通，因爲離騷裏面，以豐隆望舒等爲僕御，則以須女爲侍，亦很近情理。

屈原的後人大約會是有的。據長沙府志，稱屈原有子。雖不知其何所據，但他的故鄉還有屈姓存在，至少冥蛉也是應該有的。

屈原的故鄉，據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是在秭歸縣境內，他引袁山松說：

「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

這完全是臆解，因為屈原被放逐之地是在「漢北」（見抽思），後又自竄湘沅間，並非歸老故鄉。秭歸的「歸」字是古歸子國的子遺，金文有歸伯簋，便是那個歸國的遺器。秭字不能解，並不是因為姊姊回來而名之曰「秭歸」。但同一注上又說：

「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又引宜都記曰：

「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於今具存。」

鄉里的說法大約是正確的，但女嬃廟便是後人因離騷及其舊解而附會出來的東西。

屈原是產在巫峽鄰近的人，他的氣魄的宏偉、端直而又媿婉，他的文辭的雄渾、

奇特而又清麗，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響。關於巫峽，水經註上有一段文章描寫得很好，我不妨把它抄錄在這兒，對於屈原及楚辭的了解上或者有點幫助。

『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這段描寫是可以信任的，因爲我是經過過巫峽的人，我經過的時候是在秋天，雖然不曾領略過春冬和夏季的情景，並也不會聽見過猿聲，但那峽中的風光的確是頗有神祕的趣味。屈原的辭賦在這種的風味上很和三峽接近。

註一 殷本史記卷八十四考證引凌稚隆說。

註二 馬敘倫說「甲借爲屈，音同見紐。」見莊子義證第二十三卷十三葉。

註三 楚昭王名珍與魯昭公同時，在春秋末年。

註四 楚武王與魯隱公同時，在春秋初年。

註五 列子湯問篇有師文學鼓琴事，俞曲園謂卽昭文。呂氏春秋君守篇有鄭太師文鼓瑟事，馬敘倫也疑是昭文。（具見莊子義證第二卷十二葉。）當是楚國的人做了鄭國的官。

註六 漢書淮南王安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父，博辨，善爲文辭，甚尊重之。使爲離騷，且受詔，日食時上。」王念孫謂「傳當爲傅，傅與賦古字通。……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子解敘、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均作賦」（讀書雜誌四之九，六葉）。游國恩以爲傳或賦爲傅，傅又誤爲賦。（楚辭概論二七八頁）案以遊說爲近是。

註七 班固離騷序及文心雕龍辨騷均如是說。

註八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索隱「秦諱正，謂之端。」

註九 以上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註一〇 見古文苑。

註一一 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所作，說詳拙著石鼓文研究（商務版，孔德研究所叢刊之一）

註一二 蔣驥山帶閣註楚辭引或說。

註一三 據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戰國秦漢長歷圖（見東洋天文學研究，有沈澂氏中譯本）●

屈原的存在既不可動搖，我要進而討論他的作品。

屈原作品見於史記屈原傳的有離騷、天問、招魂、哀郢及懷沙。漢書藝文志的詩賦類首揭「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的楚詞注本是以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共二十五篇爲屈原所作，篇數與藝文志相符。而以招魂爲宋玉所作，和司馬遷的說法便相違背。關於這二十五篇的配合，後來討論的人意見紛紛不一，註一但我覺得在這兒沒有糾纏的必要。大率王逸所根據的古本和藝文志所著錄的是一套，是司馬遷以後的人所纂集的，（或者即是劉向父子所爲，）故爾和史記不同。問題的要点是當來討論：王逸所列的二十五篇是不是全爲屈原所作？招魂的作者究竟是屈原還是宋玉？各篇作品的時代是否可考？至於篇數的離合都是枝葉上的問題，並且講起來有時是很可笑的。我在下面論九章的一節中要稍稍說到。以下依王逸本的次序，就各

籍的文字來作分論。

A 離騷

離騷是屈原作的，斷無可疑。漢時的箸錄如史記屈原傳、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首見漢書司馬遷傳），劉向的新序節士篇、漢書賈誼傳、風俗通六國篇都是一致的主張着。就是離騷本身中也有它的內證。

『余以蘭爲可恃兮，

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愒兮，

椒又欲充夫佩韓，

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祇？」

這兒所說的『蘭』，王逸以爲是令尹子蘭，所說的『椒』以爲是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註謂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由前後的文意看來，這些解說是很正確的，屈原的確是在用隱喻來指責當時的權貴。因爲蘭和椒是離騷中通體所讚美着的東西在這兒突然變了，我們很可以揣察到他的用意之所在。

至於作離騷的時期，屈原傳敘在屈原被懷王疏遠之後，報任少卿書又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這兩個見解在司馬遷自己本來是有先後之不同。屈原第一次見『疏』，並不是一放逐。而屈原的被放逐是在襄王時代。報任少卿書後於屈原傳，我們可以見得司馬遷到後來是把自己舊日的見解修正了。這個修正的見解我覺得是對的。因爲離騷和懷沙、惜往日等篇的辭意氣韻多屬相同，而離騷的末尾一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也和懷沙的『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惜往日的『不畢辭而赴淵』的意趣別無二致，同是屈原所留下的絕命辭。因爲彭咸是死了的人，他的『所居』無論是在天上或地下，要屈原去

『從』都非他死去不可的。但不幸的是屈原傳在見『疏』之後，被『遷』之前又用了『放流』兩個字，被人誤解了，便生出了屈原兩次被放逐的揣測，於是乎司馬遷的第二個見解也就被湮沒了，自劉向的新序以來大率都認離騷爲屈原於懷王時第一次被放逐的作品，那是錯誤了的。又有人說屈原傳『王怒而疏屈平』的『疏』字是流字的錯誤，那也是拘泥着『放流』兩個字的誤解而生出的臆說。其實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所詆毀屈原的罪狀，僅僅是誇功，並不就是該受流刑的大罪。而且如果是受了流刑，後來又使齊，又諫王，那真真是講不通的。一筆糊塗眼就是從錯解了兩個字來，說穿了我相信是可以清算的。我要再說一遍，『放流』就是『放浪』，並不是『放逐』！

總之，離騷是屈原在襄王時真正被放逐後的東西，是屈原的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九章中有好幾篇都是這篇大作的前驅。看它已言到『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可知它的作期是在到了江南以後，大約是在懷沙之前，在長沙時做的。

還有關於「離騷」兩字的解釋，自來也異說紛紛，大率都是望文生訓的臆說，只有近時游國恩先生講得最好。他說：

「漢書楊雄傳載雄榜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古疊韻字，同在「幽」部；章昭訓爲「牢騷」。後人常語謂發洩不平之氣爲「發牢騷」，蓋本於此。『牢愁』，『牢騷』，與「離騷」古并以雙聲疊韻通轉。……其聲再轉，又爲唐人語的「憊佬」了。」註二

這個見解是很正確的，的確是一大發明。而且游先生的發明還不僅此，他又見到大招的「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中有「勞商」兩個字，王逸以爲是楚歌，他却更進一步，說就是「離騷」。「勞商」與「離騷」並爲雙聲字。註三這也是再確切也不過。但他說「離騷」「勞商」是楚國的一種曲名，好像是楚國先有了這種曲，而屈原又才來按譜作他的離騷一樣，我覺得有點不大圓滿。據我的揣想，大招本是秦人做的，大約因爲有了屈原的離騷之後，便成了楚聲的代表名，就如後人稱楚辭文體爲「騷體」的

一樣，聲轉入秦而成爲『勞商』，這也是證嬴秦之前是已經有了離騷的。還有一『駕辯』兩個字王逸也說是曲名。據我看來就是九辯。九和駕是雙聲字九辯和九歌，據離騷和天問明明說是啓樂，在大招却說是伏戲的，這也是證大招絕不是楚人的作品。還有九辯的九字並不是數目名，宋玉的九辯本是擬古，並沒有分章，洪興祖把它分成十章還勉強可通，朱熹硬要派它成九章以合『九』的數目，那是未免有點滑稽的。

B 九歌

九歌一共是十一章，目次是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這九歌和九辯一樣並不是數目有九。九歌和九辯都是夏啓王的歌曲，離騷說『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天問篇『啓棘賓帝，註四九辯九歌』，山海經的大荒西經也說『夏后開（即啓）上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璞注引歸藏啓箴『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可見九歌和九辯都是因九冥而得名。但在左傳和周禮上却已經把它當成數目字在講。左傳文七年言『夏書曰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又昭二十年言「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又二十五年言「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三項都沾扯到了五行，我看都是劉歆作的怪。做偽書大禹謨的人更糊塗到把文十年傳文的解釋語都偷去做了「夏書」。周禮的春官大司樂也說「九德之歌，九磬之舞」，這一樣是劉歆玩的把戲。左傳和周禮都是被劉歆竄改過的東西，在這些地方正一樣的露着馬脚。知道「九」並不是數名，便可以知道凡舊時的人對於這十一篇的分合以及求合於漢書藝文志的二十五篇的牽就，都是一筆糊塗賬，那是全沒有一顧的價值的。

九歌的作者，王逸以爲是屈原，當然是承襲着藝文志以來的舊說。他說：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詞。其詞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

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朱熹的楚辭集註對於他這種說法稍稍改正了一下，是說本來有那樣的神曲，但因為「文詞鄙俚」又不免有「褻慢荒淫」的地方，是放逐後的屈原把它刪改了的。到了胡適之的讀楚辭却又倡出了異論，他說：

「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

他這個新說又為陸侃如、游國恩兩位先生所承繼而擴充着，他們都說了一些理由，但都難以令人首肯。他們是看到這十一篇的內容和離騷等篇的專表憂愁幽思的不大相同，而格調也有些懸異。故爾要把它們特別區畫出來，剝奪了屈原的著作權。但這十一篇連盤看來是一個體例，必然是「一人一時所做出來的東西」。所謂格調的不同是句句用「兮」字，又把夾夾在句中，但這種句法在九章的涉江中是屢屢用着的。而且還有一個重要反

證，爲三位先生所看脫了的，便是十一篇中有河伯的一篇。楚人經常祀河，必須在楚的疆域已經達到了黃河流域以後，春秋末年楚的昭王有病，卜問的結果是黃河爲祟。他的臣下便請禱河，昭王不肯。他說的話是：

『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

這段故事見史記楚世家，也見左傳哀六年，據此可以知道河伯一篇絕不能作於魯哀公以前，而同時也可以推定是該作於楚惠王十年滅陳（是年孔子卒）以後。宣十二年邲之戰，楚軍雖曾祀河，但只是臨時性質。故爾河伯斷然是戰國時的作品，同時和它格律相同的其它的十篇也必然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游國恩先生根據國殤中有車戰的描寫，以爲『車戰之法到戰國時已經不用，可見九歌必是戰國以前春秋的產品』。註五其實車戰之全廢當在趙武靈王習胡服騎射以後，武靈王與楚懷王同時。又春秋時人稱大國每言『千乘』，而戰國時人則言『萬乘』，也是證車戰之法在戰國時還曾盛極一時。況國殤乃伊古以來之死國事者，自不能專門用新武器來從事歌詠。游先生又說到『吳戈』的吳字，以爲

吳越之吳，那也不大正確。『吳戈』其實即是『吳科』，劉熙釋名又作『吳魁』，乃盾之別名。吳國在戰國開首的三四年間早已是滅亡了的。

據我的看法，九歌應該還是屈原的作品，當作於他的早年得志的時候，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後，要這樣看，對於屈原的整個發展才能理解。因為一個偉大的詩人不能說在晚年失意的時候突然產出了一批長篇大作的悲哀詩，而在早年得志的時候却不曾有些愉快的小品。並且九歌的藝術異常的美妙，由內容看來，愛用美人香草，愛寫超現實的境界，在遺辭用意上和離騷等篇均有一脈相承的痕跡，那其間的歷程，是毫無理由要嵌上一兩百年進去的。

C 天問

天問這一篇司馬遷首先認定是屈原作的。這所依據的一定是舊說，不會有問題，那末尾有『何試上自予而忠名彌章』的一句，我推定它是作在襄王時被放逐於漢北以後，是在悲回風之後，哀郢之前。

這篇文字在研究中國的古代史上可以說是極重要的一項資料，它替我們保存下了無數古代的神話傳說，可惜直到現在有好些都還不得其解。還有它所敘述的傳說順序和北方或後代的人所『信史』化了的事跡多不相符，因此便愈使人不得其解。王逸早就說它『文義不次序』，更有妄作聰明的人說它是錯簡，替它另行編輯了一個次序的，至近人的胡適之先生更說『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以斷定爲後人雜湊起來的。』（讀楚辭）這些卻真真是活天冤枉！其實天問這篇要算空前絕後的第一等奇文字。全篇以『日』字領頭，通體用問語。一口氣提出了一百七十二個問題，以那種主於以四字爲句，四句爲節的板滯的格調，而問得參差歷落，奇矯活突，毫無板滯的神氣，簡直可以驚爲神工。而那所提出的問題，從天地開闢以來一直問到他自己，把他對於宗教信仰上的，神話傳說上的，歷史記載上的，人生道德上的各種各樣的懷疑痛痛快快地表得一個淋漓盡致。那種懷疑的精神，文學的手腕，簡直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怎麼會說得上『文理不通，見解卑陋』來呢？更單就它替我們保存下來的真實的史

料而言，也足抵得過五百篇尙書。那裏面有好些傳說還是封鎖着的，我們還沒有找到打開它的鑰匙，但有些也很幸運地是由地底的新資料出土來把它打開了的。例如：

「該秉季德

厥父是臧，

胡終弊于有扈，

牧夫牛羊。」

「恆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

何往營班祿，

不但還來？」

這幾節是敍在殷代的先公裏面的。自來不得其解，直到近年的王靜安先生由安陽小屯所發掘出的殷代的卜辭裏面發現了殷的先人中有王亥王亓和季的名字，才揭穿了這兒的

該恆季幾個字的隱謎，特別是該的故事在山海經和竹書紀年中還找着了比較詳細的記述。

「有困民國句姓而（膈）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大荒東經）

郭璞的註引古本竹書紀年云：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綿臣也。」

就這樣由種種的新舊史料參互證明，知道了該王亥殷王子亥通是一人，而有易與有扈也是傳聞而異其辭的一個國族。以上是王先生的發現。單有這一個發現也就儘足以證明天問一篇斷不是「後人（所）雜湊起來」的。而且由那里可以發掘出的寶物還沒有盡境。那裏面在敘殷的先公先王的時候，把舜和象的事也敘在裏面，這也是後代的人所不能了解的，但在殷代卜辭裏面，王先生又找着了一位「高祖饗」被他證明了就是山海經中所

屢見的帝俊，也就是後人稱爲名姦的帝嚳。嚳和夔（孫）是音近通用，夔和姦或俊是形近而譌。註六其後更經我的證明註七知道帝嚳，帝俊，帝舜，高祖夔實是一人，舜又是俊或姦的音變，因爲古代的傳說被周末北方的儒者所揉造了，把帝嚳和帝舜化爲了兩個人，故爾後來的人便於天問不得其解。知道舜就是帝嚳，那他的事蹟自然該敍在殷的先公裏面和夏的桀王以後。而舜的兄弟象，所謂「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的，敍在把有扈滅了的上甲微之後，成湯之前，也就適得其所。因爲孟子說過「象封於有庠」，有庠也就是有扈。以象的那樣詭詐，他的後嗣直到上甲微的時代才遭了剪滅，那是不能不說是「逢長」的。此外可發現的東西還很多，但要等待那種幸運，和有那種幸運的人。

D 九章

九章的目次據王逸本是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班固的離騷贊序說：「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遂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

諫』。王逸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但這九章並不是一時所作的，而九章的命名也和九歌、九辯等不同，並不是屈原所自行賦與的名字。九章中的哀郢與懷沙見屈原傳，但無九章之名。漢書楊雄傳上說：『雄又榜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也還很明顯地沒有用九章的名字。朱熹以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我看是說得最爲恰當。這輯錄的人我怕就是劉向父子。因爲恰好有九篇，故彙集起來，仿效誤解了的九辯與九歌的意思，而名之爲九章。

關於九章的次第，研究者的意見也各有不同。據我看來，橘頌作得最早，本是一種比興體，前半頌橘，後半頌人，所頌者不知究係何人。這裏面找不出任何悲憤的情緒，而大體上是遵守四字句的古調。其餘的八篇氣象和格調都迥然不同，都是在襄王時被放逐以後作的。

關於屈原放逐的年代，我的見解和舊時的人不同。我始終認定屈原在懷王時不會被

放逐。而他在襄王時的逐放應該在襄王六年以後。這裏史記楚世家上有一段紀述是值得注意的。

『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在懷王死後三年之間秦楚是斷絕了關係的，屈原是主張絕秦的人，秦楚的斷絕關係，便是屈原的主張得到勝利，屈原在這期間沒有被放逐的理由。在襄王六年議與秦恢復舊好，到七年公然又腆顏事仇的時候，屈原一定是力爭過的，但他終竟遭了失敗，所以他的被逐當在這一二年間或稍後。離騷上所說的『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抽思上所說的『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都應該是指的襄王初絕秦而又改變的這段事實。故橘頌以外的八篇和離騷，天問都是襄王

六七年以後的屈原的晚期作品。

至於那八篇的先後在我看來該得以悲回風、惜誦、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懷沙、惜往日爲次。悲回風最爲悲憤，是他初遭放逐時感情最激烈的時候做的。惜誦，抽思和思美人要來得緩和一點，是悲憤稍稍平淡了，由追憶的情懷所盪漾出來的東西。據抽思的『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可以推定屈原的謫地是在楚國的北境。思美人和抽思的情懷是相連的，大約是一個時候的作品。那裏面說『指嶠家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也明明表示他在北境。但又說『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好像又在南邊。但我們要注意那個『將』字，他是說到明年開春的時候想到南方去。故爾那篇末的『獨歿歿而南行』也和抽思的『枉顧南行聊以娛心』是一樣的。哀郢以下的諸篇當作於到了江南以後。

哀郢的一篇，應該從王船山說，是襄王廿一年楚爲秦兵所敗，郢都爲秦白起所據，『東北保於陳城』時做的。註八那時候白起的軍勢來得異常凶猛，史記僅說他『據郢燒先

王墓夷陵，而韓非的初見秦却說『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伏於陳』，楚國實在到了幾乎快要亡國的形勢。哀郢開首的幾句：

『皇天之不純命兮，

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完全紮的是國破家亡的情感。『東遷』就是『東北保於陳城』。又所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夏通廈，王逸注爲『大殿』，最爲正確，也可以想見那時的焚燒的慘狀。我們請想，屈原是被放逐在漢北的。當秦兵深入時，他一定是先受壓迫，逃亡到了鄧都，到鄧都被據，又被趕到了江南。到了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連着做了涉江、懷沙、惜往日諸篇，便終於自沉了。

哀郢的『東遷』是在『仲春』。涉江『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是說秋冬的

寒風還有緒餘，時令是相接的。懷沙說『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南行的時刻是在孟夏。『懷沙』當據蔣驥說是懷長沙的意思。（山帶閣註楚詞。）屈原南行至長沙，由長沙再返向汨羅，故有『進路北次』之語，戴震屈原賦注所引的方晞原說也是很正確的。到了惜往日便言『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又言『不畢辭而赴淵』，那自然是屈原的絕筆了。據傳說屈原是死於五月五日，時令也是完全相連接的。

以上就我的考察，屈原的死是在襄王二十一年，那嗎屈原的年紀便好像有點問題。屈原是生於西紀前三四〇年的正月初七，那年是楚宣王卅年（周顯王二十九年），下距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西紀前二七八年），共六十二年。屈原要算活了六十二歲。這個年紀似乎未免太長。但涉江上明明說過。

「余幼好此奇服兮，
年既老而不衰」。

古者『七十曰老』註九和這實在的年紀是相符的。屈原有那樣大的年紀還要自殺，這好像又有點難解。但在這難解之中剛好證明哀郢一定是楚襄王廿一年國破遷陳時的作品。因為屈原被放逐了，是忍耐了多年而沒有自殺的人。哀郢說『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這九年還不僅只是九個年頭；因為九在古是視為極數，他的被放自襄王六年至廿一年是應該有十五個年頭的。他忍耐了這樣久而沒有自殺，可見得單單的被放逐與不得志，不能成為他的自殺的原因。他的所以年老了而終於自殺的，是有那項國破家亡的慘劇存在的！

E 遠遊、卜居、漁父

這三篇並不是屈原做的，陸侃如和游國恩兩位先生論得最為明白，註一〇我無異辭。只是遠遊整鈔離騷和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地方太多，而結構與大人賦亦相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賦的初稿。史記相如列傳說：『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據此看來，分明是有未就的稿本與具奏的定本兩種。因為稿本未脫楚辭的窠臼，不好拿去見皇帝，

所以他以『未就』目之。待到具奏本，他只把稿本的精粹語保存了下來，而用自已既成的風格來完全改作了一遍。稿本被後人尋得，因首韻有『遠遊』二字遂摘以爲篇名，又因多整襲離騷的地方，遂被收入楚辭而誤認爲屈原所作。卜居和漁父當是宋玉，景差之徒作的，都是很輕妙的文章，而且還替我們保證着屈原是果有其人。

F 招魂

這篇文章史記明說是屈原的作品，據我看來也明白地是爲追悼楚懷王而作：因爲那所敘的宮庭居處之美，飲食服御之奢，樂舞遊藝之盛，不是一個君主是不能夠相稱的。王逸認爲宋玉做來招屈原，林雲銘輩又認爲是屈原自招（楚辭燈），都是錯誤了的。屈原是自稱爲『賤貧』的人（惜誦『忽忘身之賤貧』），那裏有那樣的豪興！認爲自招的人的根據，是在文的開首有一個『朕』字，文的煞尾有一個『吾』字，那些第一人稱代名辭誠然是作者的自稱，但被招的却不是這『朕』和『吾』，那頭幾句是：

『朕幼清以廉潔兮，

身服義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

牽於俗而蕪穢。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長離（罹）殃而愁苦。」

這兒所說的『主此盛德』便是指的懷王，是說以此有盛德者爲君，而此有盛德者不幸爲俗所牽累，遭了蕪穢。這上古以來所未曾見的盛德者，不幸是長久受了禍殃而不得解脫。須要知道『牽於俗而蕪穢』的並不是『身服義而未沫』的『朕』，不然那文義豈不矛盾？

再看煞尾的所謂『亂』。那兒開首說『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接着又說『與王媿夢兮騷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落尾是『魂兮歸來哀江南』，這兒的『吾』和『君王』也是分析得明明白白的。自稱爲『吾』者所招的『魂』自然是『君王』的魂而不是

「吾」的魂了。

還有招魂中巫咸的招辭都在每句的煞尾上有一個「些」字，有人說這是空前絕後的
一種體裁，又有人說和「兮」字，音同字通，都不是妥當的見解。據我看來「些」字和
周南漢廣與周頌賡的「思」字是一個系統。

漢廣

「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註二

漢有遊女，

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寶

「文王既勤止，

我應受之，

敷時釋思。

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

於釋思。」

體裁和招魂完全相同，些思是一聲之轉。至於兮字古音當讀如阿，關於這個字孔廣森有
一段很透闢的見解。

「兮，唐韻在十二齊，古音未有確證。然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斷斷兮」，似兮猗音義相同。猗古讀阿，則兮字亦當讀阿。嘗考詩例助字在韻句下者必自相

協。若墓門之止同用，北門之哉同用，采菽之矣同用，皆「之哈部」字也。兮字則施丘，君子偕老，遵大路皆與也字同用。今讀兮爲阿，於也聲正相類。又九歌「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天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虧字亦五支之當改入「歌戈」者。說文本從丐，或從兮，未必非兮聲也。」

（詩聲類「陰聲歌類」末附）

這個見解是無可懷疑的。從字形上說來兮字是叫人張口發出丐（同考）聲，八就是張口的意思，那樣發出來的聲音自然和阿聲極相近。知道這個兮字的發音來讀楚辭的時候，可以知道楚辭就是當時的白話。兮字的所在是表示音節的讀法，這種讀法在後人讀詩的音調上也是保存着的。譬如我們讀王績的過酒家：

「此日長昏飲，

非關養性靈。

眼看人盡醉，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何忍獨爲醒？」

在「飲」字和「醉」字下總是要拉長着發出一個「阿」聲來的。讀七言詩時也是這樣，又如這個阿聲讀五言時放在每句的第二字下，讀七言時放在每句的第四字下，那便成爲九歌的體裁。知道這層可以解決得楚辭兮字的祕密，同時也可以知道詩經中何以國風裏面常見兮字，而大小雅和周頌裏面幾乎一個也沒有，註一二因爲國風是當時的民間的口頭文學，而雅頌是當時的廟堂文學。

兮字在古時北方的文字中每每用乎字來代替。乎字最古的發音應該是哈（ḥ）感嘆詞的「烏乎」也就是「啊哈」。烏是鴉的古字。是由鴉叫的聲音得來。

還有孔廣森說和兮字協韻的「也」字古音是讀如「呀」的。關於這個字，陸侃如在楚辭裏發現了一個祕密，他說「覺得他（也字）實等於疑問號及驚嘆號」。註一三我們如曉得把它當成呀字讀，他這種說法是可以不用解釋的。

據此可知古時的人用猗兮乎也，也就和今時的白話文用啊呀吧嗎一樣，固執文言的

夫子們對於前者叩頭百拜，對於後者則肆口謾罵，其實他們自己是毫不通古文的。

在這兒我順便還要解決一個字，便是楚辭在煞尾處每每要用短歌來作結，稱爲「亂」，如離騷，抽思，哀郢，涉江，懷沙，招魂都是有這「亂」的。抽思的煞尾更是用的三重奏，有「少歌」，有「唱」，最後是「亂」。少歌即小歌，「小歌」，「唱」，我們都可以了解，「亂」實在令人難於了解。王逸說：「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古書上也每每有訓亂爲治的，註一四其實這已經就是一件怪事體，治亂音既不同，義又正反，那裏會有相反的東西來相訓的呢？假使亂可以訓治，調理，那嗎理和治不也可以訓爲亂嗎？爲着一個「亂」字，講尚書的人就每每鬧亂子，但在我們研究過殷周金文的人，這件怪事是已經解決了的。古金文凡司徒，司馬，司空的司字都作亂，有治理的意思，即治絲之象。有時也寫作辭（見兮甲盤銘），兩個字其實是一個字。古文的亂字只作亂。或作亂。亂字實在是別字，是亂字寫錯了的。凡是古書上有亂字應該訓治的地方應該通作亂。亂就是辭，可以知道楚辭的「亂曰」本來是作「亂曰」，即「辭曰」，便

是楚辭的『辭』的命名之所由來。賈誼的弔屈原賦上又作『訊曰』，那也是詞字的錯誤，即是『詞曰』。據此可知楚辭的『辭曰』在漢初還沒有弄錯，是後世的不通古文的人把它認錯了的。這一錯一直錯了兩千多年，我相信那些不通古文而盲從古文的人，就經過我這樣的說穿，恐怕也還會有人以為我是在搗亂的罷。但這個亂字實在是值得搗它一下。

以上我把屈原的作品通同檢點了一下，據我看來他的作品是可以分爲三期。

第一期 橘頌，九歌，招魂，

第二期 悲回風，惜誦，抽思，思美人，天問，

第三期 哀郢，涉江，離騷，懷沙，惜往日。

橘頌，九歌最早，絕對的年代不能斷定，大抵作於楚懷王時，是四十歲以前的東西。招魂作於楚懷王死時，是襄王三年，屈原四十六歲時做的。第二期的全部作於五十歲以後至六十二歲，長久被放逐在漢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三期的全部是作於六十二歲一二。

三、四、五的幾個月之間，是詩人精神的最後一次的強烈的燃燒。在這兒或許又有人要發出疑問：屈原到了那樣大的年紀爲什麼還有那樣的魄力，作得出離騷那樣的長詩？這一個疑問，我們如想到德國的歌德在他八十歲前後把浮士德第二部完成了的事例，是無須乎再費筆墨來解答的。

註一 參看游國恩著楚辭概論一〇七頁。

註二 楚辭概論一二五頁。

註三 同上二四頁。

註四 原作商，乃音之譌，古金文音與帝通。

註五 楚辭概論七八頁。

註六 王說見觀堂集林卷九「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及「續考」。

註七 拙說見甲骨文字研究上冊「釋祖妣」。

註八 見王船山楚辭通釋。

註九 見說文及禮記曲禮注等。

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

註一〇 參看陸游二位所著屈原及楚辭概論。

註一一 此思字今本誤爲息，今正。

註一二 魯頌有賦有兮字，因爲已經是春秋時的作品。但兮字也極少。商頌也是春秋時的作品，也沒有一個兮字，因爲同是臺閣體的原故。

註一三 參看屈原附錄第六頁。

註一四 則亂爲治的地方極多，可參考經籍叢書卷七十四的「十五輪」的亂字註。

中國的真實的文化期是起源於殷代。殷人在紀元前一二〇〇年前後爲周人所滅，周人便承繼了他的文明。周人本來是後起的民族，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時候，都還是穴居野處的蠻人，註一因爲殷代的末年特別是帝乙和帝辛的兩代征伐東南夷，幾乎是傾盡了全力，沒有功夫顧到西北，因而周人便乘着機會崛起了來。

關於東南夷在後漢書的東夷傳上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那裏說：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這裏面所列的九夷不一定都在東南，有些是在東北或北方的，如像畎夷便是犬戎即匈奴。但如于夷和方夷便的確是在東南。帝乙時代的卜辭裏面征伐夷方和孟方的紀錄很

多，而且期限也很長，註二師次的地方大都是在山東和淮河流域一帶。夷方大約就是方夷，孟方一定是于夷。到殷紂王的時候，左傳昭四年說：「商紂爲黎之蒐而東夷叛之」，又在昭十一年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可見得殷紂王實是打了勝仗而至於亡了國。這殷和周的關係頗有點像後來的吳和越的關係。吳到中原，在黃池會上與晉爭雄長，而他的後方却爲越人所襲擊。註三周和越是佔了漁人之利的。

周人是沒有文化的民族，他把殷滅了，把他的文化承繼着，在中國的北部自然有所損益地又發展了下來。殷人雖然亡了國，但他的後人有一部分還存在，那便是宋國，在今河南商丘縣以東，江蘇銅山縣以西的一帶地方。還有殷的同盟國徐和楚，起初都是淮河流域的國家，後來漸漸發展，徐的疆域到了江西，楚的疆域到了湖北湖南。徐，楚在西周時代被稱爲徐戎和荆蠻或淮夷，但徐楚兩國並不是殷朝時候所說的夷人。殷朝的夷人大約是吳越，是被殷人驅逐到了長江以南的。說苑善說篇上有一首越人歌，是西紀前五世紀中葉的鄂君子皙汎舟時所得的。註四那原文是：

『濫兮拊草濫予昌楛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瀘秦踰滲惺隨河湘。』
這首歌到今還不知道該怎樣讀。（最近聽人說：有人研究了出來，同於苗歌。其所研究，余尙未見。）當時的楚人子皙也不懂，叫了『越譯』把它翻譯了出來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這要算是中國最古的譯詩，無論怎樣看都還是兩種國語。我們據此可以知道楚和越在古是不同的民族。吳越人的漢化一定是受了徐，楚人的影響。吳的支配者雖然是周人的伯夷，仲雍，但他們初到吳時也是半個蠻子，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傳播着殷代的文化在中國南部發展的。

就這樣同是由殷人所創出來的文化，在殷朝滅後分爲了兩大枝，一枝在周人手下在北部發展，一枝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發展。西周三百六十餘年間南北是抗爭着的，周人一直把徐楚人當成蠻夷，但南人並不是那樣的蠻子。宋時在湖北武昌出土的楚公逆鐘，

經孫詒讓的考定註五知道楚公逆就是熊罥，熊罥元年當周宣王二十九年，那銘文的字體異常雄壯，銘辭明白的也有「佳（惟）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夜雨雷罇。……逆其萬年又壽。……孫子其永寶」的句子，和周人的銘文並沒有怎樣的差別。

徐人也有很多古器，註六有沈兒鐘，徐謚尹鉦，徐王鼎，義楚鐘，徐王義楚鐺等，銘文都是韻文。我現在把那些銘文通錄在下邊。

沈兒鐘（爲了易於了解之便古字多已改書今文。）

「佳正日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沈兒，擇其吉金，自作和鐘。中翰且揚，元鳴孔皇。孔嘉元成，用盤（樂也）飲酒，和會百姓。淑于威儀，惠于明祀。獻（吾）以晏以喜，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庶士。皇皇熙熙，眉壽無期，子子孫孫，永保鼓之。」

徐謚尹鉦（文中用×者表示缺文。）

「佳正月，月初吉，日在庚。徐謚尹×故×自作征城。（征城卽是鉦之古名。）

×諸父兄，傲至劍兵，億萬子孫，眉壽無疆。皿（通孟，勉也。）彼吉人享，士余是尙。」

徐王鼎

「徐王糧用其良金，鑄其饗（將）鼎。用膺庶職，用饗賓客，子子孫孫，世世是若。」

義楚鐘

「佳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儼兒，余迭斯于之孫，余幽恪之元子，曰於康（嗚呼）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深之字父。余俾儼兒啟（通擇）吉金鐘銘，以鑄和鐘，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餉歌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

徐王義楚鐘（解）

「佳正月吉日丁酉，徐王義楚擇其吉金，自作祭鐘。用享於皇天及我文考，永保怡（余）身，子孫×寶。」

最後的徐王義楚鐘是前清光緒年間在江西高安出土的，義楚便是左傳昭六年「徐儀楚聘于楚」的儀楚，是在春秋末年。因此可以知道義楚鐘也是同時代的作品，其餘三器年代雖不明，但大抵是春秋年間的東西。我們請細細讀那些銘文，可以知道那和北方出土的東西沒有多麼大的差異，而且和周人的雅頌格調也有一脈相通的地方。

還有一種王孫遺者鐘是出土於湖北的（地名未詳）。有人說是楚器，但我疑是徐器，遺者怕就是禮記檀弓上的徐人容居，遺容雙聲，者居疊韻，那文字和沈兒鐘相彷彿，更要堂皇。

王孫遺者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擇其吉金，自作和鐘。中翰且揚，元鳴孔皇。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壽。余宏翼舒夷，畏忌翼翼。肅哲聖武，惠于政德。淑于威儀，謀猷丕飭。闡闡和鐘，用晏以喜。用樂嘉賓父兄，及我朋友。余恁的（通台，我也）心，誕×余德，和洽民人，余敷甸于國。煌煌熙熙，萬年無期，億萬

孫子，永保鼓之。」

還有受了徐楚影響的吳越也有不少的古器，特別是吳國，有者減鐘十二具，是前清乾隆二十六年（西紀一七六一年）在臨江出土的。據說「臨江民耕地得十一鐘」（見「甯壽鑑古」）有人說臨江卽今江西清江縣，但我恐怕是安徽的和縣，劉宋時曾置臨江郡於此。經余研究。鐘亦確是十二具，有一具近藏劉體智家，與前所著之十一具均不同，可知出土時曾有匿藏未報者。其鐘有七具的銘文，共有八十多個字，但均甚殘泐，經我把它們參綴起來，才成了全文。註八

者減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黻（然）之子者減，擇其吉金，自作瑤鐘。不帛（白）不聿，（辟）不鏐不彫，協于我靈籥，俾和俾孚。用祈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若召公壽若參壽，俾汝惠惠歆歆，和和欽欽。其登于上下××，聞于四旁，子子孫孫，永保是尙。』

吳國古時候是稱爲勾吳的，這兒的工廠也就是勾吳。黠字是古然字，皮然便是吳王柯轉。據史記吳世家知道柯轉（史記誤爲轉，此據譙周古史考）的兒子是頗高，頗高的兒子是句卑，句卑時晉獻公滅虞（春秋僖五年）。者滅是頗高的兄弟行，可以知道他的時代是在春秋初年。

上面所舉的一些古器銘，因爲是古書上所沒有的東西，所以我特別一一把它們整錄了出來，爲使讀者易於了解起見，所有的古字我大抵都寫成了現在的通用文字，但那裏面有許多文句仍然是難解的。要想一一加以解釋的時候，這一本小冊子恐怕會要寫滿，我在這兒只好希望讀者本『好讀書不求甚解』的辦法去讀它們一遍，讀了便可以有下列的幾個見解從那兒抽釋得出來。

（一）南方的江、淮流域在春秋以前已經是有高度的文化。周人罵徐楚是蠻子，那是周人的敵愾心所發出來的不公正的批評。

（二）南方的文字也有『臺閣體』和周書的詰命，周詩的雅頌相彷彿，而和楚辭的風

格不同。

在這兒可以見到屈原思想的淵源和他的藝術的特異性。

楚辭中使用的方言，即當時的白話，最多。如像『兮』字『些』字是人人所知道的楚辭的特徵，後世的文人對於有這種字面的文辭特別稱爲『騷體』，也就是見到了這兩個字的特異。但是『兮』和『些』都是寫的當時的口音，可以說就是白話。還有一個『也』字用來表示疑問和驚嘆，是和今人的『呀』字相當的，也是當時的口語。這些都是在上面說過的。不過這三個字的使用不始於楚辭，詩經的國風中多用兮字句，屈原以前的南方人的詩文也多用兮字，些字在周詩中已有『思』字的先例，『也』字尤其是春秋以來的散文家所慣用的，秦文又多用『噫』字來替代，這些都不是屈原的獨創。只是屈原把『兮』字和『些』字用得更多，而『也』字用得更特異些吧了。

此外爲屈原所使用的楚國的方言，據可考的有如下列。

(1) 汨——離騷『汨予若將不及兮』，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2) 騫——離騷「朝騫馳之木蘭兮」，說文云「拔取也，南楚語」。

(3) 莽——離騷「夕肇洲之宿莽」，方言云「莽草也，南楚曰莽」。

(4) 馮——離騷「馮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滿也，楚人名滿曰馮」。

(5) 羌——離騷「羌內怒己以量人」，王逸注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爲也」。案此字在屈原作品中凡十三見，用「卿何爲」意，多講不通。據余所見，有些地方當成乃，有些地方當成而，有些地方只表示感嘆。又有審或蹇字用爲語詞者凡八見，余意乃羌之輕一層的口氣。

(6) 詠——離騷「謠詠謂予以善淫」，方言云「詠，勗也。楚以南謂之詠」。

(7) 侘傺——此二字連語凡五見。離騷「侘傺予侘傺」，王逸注云「楚人名住曰侘」。又惜謫「心鬱邑予侘傺」，注云「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爲侘傺」。方言亦云「侘住也。南楚謂之侘」。

(8) 閭闔——離騷「倚閭闔而望予」，說文：「閭，天門也。楚人名門曰閭闔」。

(9) 簞——離騷『索瓊茅以筵簞』，王注云『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簞』。

(10) 軼——離騷『齊玉軼而並馳』，此軼言轂端鎗也，方言云『關之東西曰輶，南楚曰軼』。又『輪，韓楚之間謂之軼』。

(11) 遭——離騷『遭吾道夫崑崙』，王注云『楚人名轉曰遭』。

(12) 靈——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王注云『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

(13) 壇——湘夫人『荃壁兮紫壇』，高誘云『楚人謂中庭爲壇』。

(14) 襟——湘夫人『遺予襟兮澧浦』，方言云『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禪衣』。

西謂之禪衣』。

(15) 哈——惜誦『衆兆之所哈』，王注『哈笑也。楚人相謂調笑曰哈』。

(16) 悼——抽思『心震悼而不敢』，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

(17) 筱——懷沙『鳳皇在筱』，方言云『籠、南楚江河之間謂之筱，或謂之筱』。

(18) 詔——惜往日『或詔謾而不疑』，說文『涿州謂欺曰詔』。

(19) 娃——惜往日『妒娃治之芬芳』，方言『娃，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秦晉之間曰娥。

(20) 閉——招魂『去君之恆幹』，注云『幹或作閉』。閉、里也，楚人名里曰閉。

(21) 爽——招魂『厲而不爽』，注云『楚人名譏敗曰爽』。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口爽』，同此意。老子爲戰國時楚人環淵所輯錄，註九也足以證明爽爲楚國方言。

(22) 蔽——招魂『菑蔽象棋』，方言『博謂之蔽』，秦晉之間謂之博，吳楚之間謂之蔽。博蔽一音之轉。

(23) 瀛——招魂『倚沼畦瀛』，注『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中曰瀛。

(24) 夢——招魂『與王趨夢』，洪興祖補注『楚謂草澤曰夢』。

此外涉江有『欸秋冬之緒風』一句，洪興祖補注引方言云『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但這個字在原文是動詞，並不是用爲然字，我看是假借爲哀，這一例當除外。

還有「離騷」兩個字也是楚國的口語，梁章鉅的文選旁證引項氏家說「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遠者距違。』」又王伯厚困學紀聞「伍舉所謂「騷離」，屈原所謂「離騷」，皆楚言也」。這雖然不是白話入文，而是以白話命題，尤其是創例。

白話入詩已經可以說是詩體的解放，然而更有醒目的是楚辭中詩的句法之延長與詩的篇章之放大。

中國古代詩歌的句法多是以四言爲定格，詩經裏面的風雅頌是這樣，秦人的石鼓詩，以及始皇帝的各種刻石辭也是這樣。就連周代的彝器銘文凡有韻的也都是這樣。這種定格在南方的有韻的金文中，如上面所舉出的那些，也毫無改變。只有在春秋、戰國時人的有韻的散文裏面才有些把這種格律解放了。易經中的韻文也多是解放了，但那經部是纂成於戰國初年，傳部多是秦始皇時荀子的門人所做的（此別有說）。註一〇真正的在詩中的解放只有在南方的歌謠裏面可以看見，如上舉的越人歌的楚譯是絕好的例子。

還有孟子離婁上的一首孺子歌：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是孔子聽得來的東西，（漁父辭裏面的漁父亦唱此歌，足證其晚成）大約也是南方的歌謠。因為是孺子，出口自成天籟，故爾沒有拘守一定的格律。左傳哀十四年有吳申叔儀乞糧歌：

「佩玉蕊兮，

余無所繫之。

旨酒一盛兮，

余與褐之父睨之。」

也沒有遵守四言的格律。這些歌自然可以稱爲楚辭的前驅，但都是突口而來的，並不是經意的創作，同時也就可以說是白話詩。呂氏春秋的音初篇上又有候人歌，只單獨的一句。那兒說：

『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禹的傳說自然是僞托，但這單獨一句的候人歌確只是一句表示着情緒的白話。大率古時白話的土俗歌謠是不遵守一定的格律的，而一到詩人手裏，要經意做作起來的時候，便立地爲四言的格律所限定了。國風應該有大部份是民間的歌謠，然也多是守着格律的，我相信是經過了孔門的刪改。國風所採集者十餘國，雅頌所該括者數百年，而詩之音韻格調無地方色彩與時代差異，即此便足以證明，詩是經過整齊劃一的工作的。時當在春秋與戰國之交，人當不限於一人。

然而詩歌一到了楚辭，便是有意識地成就了一番偉大的革命。楚辭，特別是屈原的

作品，都是輕意的創作，除掉天問一篇還多少遵守着四言的格律之外，其餘的可以說是全部打破了，招魂中的巫咸的招辭雖然貌似四言，但如果把那可有可無的表示口音的『些』字刪去，差不多是一首長篇的七言詩，和舊式的格律大有不同。離騷和九章的一部分如把『兮』刪去，主於是六言詩。九歌有一部分如把『兮』刪去便是五言詩或長短句。後來的詩句的變化幾乎是爲屈原一人所嘗試盡了的。這項工程無論怎樣不能不說是屈原的天才之所致。屈原之所以成就了這項工程的重要原因，我看就是因爲他利用了自成天籟的歌謠體。他是利用了歌謠的自然韻律來把臺閣體的四言格調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誇張的給他一個尊號，是最偉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話詩人！

有了白話入詩，有了自然韻律的採用，其必然的結果便是詩的篇章之擴大。這層是用不着多說的，只消把篇幅較長的大小雅來和離騷天問比較一下，便可以明白。在這兒我要附帶着說一句。楚辭裏面的作品，舊時的人多不把它們當成詩看待，有的說是賦，有的更別立一個『騷』的名目，『騷』的命名之不通自無庸說，賦只是詩的一體。更要

嚴格的說時，詩是限於抒情的，那麼屈原的作品更全部都是詩。後起的一些舖張揚勵的漢賦大多只是一些有韻的散文而已。

屈原作品多有超現實的着想，如像描寫天國，如像自然物的擬人化，和周人的雅頌是有天淵的不同。周人也有天堂的觀念，如大雅文王篇的『文王在上』，又『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之類，但他們只是率直地當成一種事實敘述着，絲毫也沒有馳騁過一下想像的羽翼。這個差異自然和民族性質與自然環境有關，但也可以說是殷、周人的文化色彩不同。周人固然是承繼着殷人的文化的。但它是經過了他們自己的一番損益，把合於自己的民族性質的，便於自己的政治統制的，保存了下來，把那些不合的，不方便的，便抑制着聽它萎縮了。殷人是富於超現實性的民族，他們是最迷信鬼神的。這層在殷代卜辭中有古物上的證據。就卜辭看來，殷人除掉自己的祖宗和至上神的天帝之外，風雲虹霓河岳都是視為神祇，而一切大小事件都是要用龜卜來請命於鬼神的。並且他們對於卜的迷信之深實在可以驚人；因為卜辭中每每有記載着卜的效驗的文字，而那時效之長有

至一百七十六日的。註一占卜一次有半年的時效，那是再沒有不靈驗的占卜的了。這種迷信的習慣便是爲周人所摒除了的東西。周人，特別是周初的周公，在把殷人的天下奪取了之後，他只利用了鬼神來做愚民的宗教政策。且看周書君奭篇上周公所說的『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便最爲明白。禮記表記上有一節話批評殷周人的宗教態度，是說：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這個批評是道着正鵠的。殷人的超現實性被北方的周人所遏抑了的，在南方的豐饒的自
然環境中，卻得着了它的沃腴的園地。楚辭的富於超現實性，乃至南方思想家之富於超
現實性，我看都是殷人的宗教性質的嫡傳，是從那兒發展了出來，或則起了蜕化的。屈
原作品中常有靈巫在演着重要的節目，那便是絕好的證明；而屈原始終崇拜着殷代的賢
者彭咸，也正明白地表示着他的超現實的思想的來歷。

在招魂裏面還有關於地獄的描寫。地獄名爲『幽都』，有土伯執掌之，土伯有角，三目，虎首牛身。有人以爲是印度傳來的思想。但堯典言『宅朔方曰幽都』則幽都在北，並非南來系統。我疑仍是殷人舊有的思想，在南方尚保存其固有的面目，在北方則僅存其名號，儼然成爲地上的地名了。

不過這種超現實的宗教性質的思想，與其說是屈原思想的特徵，甯可說是楚國人的一般信念。宗教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家中，除掉墨家之外，大多是遭了揚棄的，屈原個人也正不免受着了這種時代精神的激盪，他自己是取着懷疑的態度的。

屈原的懷疑的態度，在天問一篇中表示得最爲明白，那兒不僅是對於帶着宗教色彩的神話傳說表示着懷疑，竟連一切歷史上的記載，人事上的倫理，一概都表示着不能信任。在這篇之外，他的這種態度也是具現着的。例如在招魂裏面，他借着巫咸的口叫懷王的靈魂不要往天國裏去，他說那兒有豺狼虎豹盤據着，靈魂走去很危險。又例如在離騷中他駕着玉虬，乘着鳳凰往天上去，到了天國的門前，叫門子開門，而那天國的門子才

倚着天門望着他，不肯打開，好像也要點開門禮的樣子，使他嘆息連天國中也沒有好人。（『哀高丘之無女』。）連天國他都不視為極樂的地方，這種懷疑的奇拔的着想似乎是古今獨步的。

屈原一方面在極端的懷疑，一方面又在文字中多採用超現實的資料，這很像是一個矛盾，但這正表示他是藝術家而非思想家。他在藝術家的立場上從事創作時，所有已成的具像化了的思想觀念是樂得利用的。他是利用來做文章上的藻飾，而非信仰着以為實踐上的規範。假使上帝、百神、天堂、地獄那些觀念他真正是信仰着，那他是絕對不會出於自殺的了。他之所以終於自殺，正是他的懷疑精神的必然的結論。

屈原在他的倫理思想上卻很是受了儒家的影響。他的實踐上的行為卻很是一位現實的人物。他持身極端推重修潔，自己的化名是正則和靈均，又返返復復地屢以誠信自戒，而對於君國則以忠貞自許。如像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抽思）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懷沙）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同前）

『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惜誦）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

這些類似格言的辭句，和儒家的口吻是毫無二致的。還有他所景仰的古人，如堯、舜、禹、湯、文王、箕子、比干也是儒家典籍中所習見的人物。最可注意的，他雖是南人，而於道家的虛無恬淡，寂寞無爲的學說卻絕沒有沾染。（遠遊那一篇本有這種臭味的濃厚的表現，但那並不是他的作品。）由年代推勘起來，我揣想屈原或者怕是陳良的弟子，他在年少的時候便有橘頌那樣的文章，我相信他至少也該得是受了陳良的影響。孟子的滕文公上說：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陳良本是有弟子的人，在孟子裏便有宋人的陳相、陳辛兄弟，又加以孟子那樣的推崇他，足見他一定是南方的一位大師，是儒術在南方的傳道者，從年代推考起來，他正好可以充當屈原的先生。

屈原又根本是一位愛國者，他的作品這樣告白着，他的行爲也這樣告白着。先秦時代的學者自孔子以來大率都是懷抱有大一統的主義的，他們都想要把中國的局面統一起來，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他們都有一個不擇國而仕的傾向。早輩的孔子、墨翟不用說，和屈原同輩的，如本是鄒人的孟子而求仕於齊、梁，本是趙人的荀子而仕於楚，本是楚人的環淵、陳良、許行、環淵爲齊稷下先生，陳良北學於中國，許行自楚之滕，願做滕文公的編氓，本是韓國的公子韓非入秦而勸秦滅六國，這些都足以證明當時的學者們是志在天下而不在一國。但是屈原卻不同，他在懷王時遭了疏遠，雖然放浪着而他不肯出國，他在襄王時受了放逐，雖然顛沛着而他也不肯出國，他始終是眷念着楚國，希望自己能夠復位，希望自己所懷抱着的『美政』（見離騷）能夠實行。

他之所以不去國，並不是他不能，他是可能的。特別像齊國，一定會歡迎他，因為他本是親齊的合縱派，他並且是出使過齊國的人。齊國在戰國時是最獎勵學術的一個國家，史記的田敬仲世家上說：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屈原假如肯到齊國，齊國縱使不會以政治上的實權給他，至少可以讓他『不治而議論』或者『不治而做詩』，做一位名譽上大夫。屈原卻不肯去，而始終是流離顛沛着，陷在楚國。

但他也並不是不想走，他的作品中想走到四方去尋求知己的話是屢見不一見的，特別是在離騷中他借巫咸的口說出來的話最爲明白：

『勉陞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

這不用說本是他自己的心事，但他這個心事終竟沒有實現。他這種心事多少是包含有爲求一己的安全的意思，但他知道就到外國去，他的根本的懷抱不見得便能夠實行，就如孔子周遊天下而卒老於行，孟子往返齊、梁而終歸退隱的一樣，他也是儒者之徒，這些前轍當然是很見到了的。他的根本的心事是期其君爲堯、舜而自許以皋陶，他是想把楚國來統一天下的。請看他說：

『彼堯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忽奔走以先後兮？

及前王之踵武。』（離騷）

他所想走的道路就是這樣的道路，他所企圖的目標便是要追蹤唐、虞、三代。在當時的楚國，以疆域而言比秦、齊還要大，以富庶而言是佔着長江流域，想實現他的目的實在

是很有可能的，他之所以始終不肯去楚，也就是這個原故。本來在中國の開拓上楚國人是很有功勞的，左傳昭十二年載着楚靈王的話說：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

可見長江流域多半爲楚人所開闢出來的地方。長江以南的百粵、閩、甌本爲北方的文化所不及，然在漢初已經有相當的文化，可知多是受了楚人的影響。楚人開拓了中國的南部，和早就由殷人所開拓出的中國北部，在戰國末年已經得到文化上的統一的時候，楚人再進一步本可以完成全中國的政治上的統一。然而在這個政治鬥爭的局面上他遇着了那個崛起於西北的坐享現成的秦人。秦人是後起的民族。佔着居高臨下的形勢，在軍事上得到了很大的便宜，終於像周人把殷滅了的一樣，把六國滅了。六國中的楚國，我們可以知道是會最不甘心的。他們費了將近一千年的南方的經營，由整個的中國民族說來是有不能磨滅的功績，而在當時的楚民族卻要算是『功虧一簣』。秦、楚爭霸的焦點恰好在懷、襄兩世，而屈原又恰好生當在這個時候，懷襄二王假使真真是有爲之王，或者

最後的勝利也不見得便要屬於秦人。然而楚國的文化是太高度化了，我們看到招魂上所敘的王者生活的鋪張，前年在壽縣出土的考烈王和幽王墓中的古器的奢侈，可以知道一些中庸之主要想不偷逸苟安是不易辦到的。屈原是明白人，天下的大勢他看得很清楚，他始終是抗秦派，然而他的政策終不見實行，而卒於在自己的存世之中看見了楚都的破滅。這樣豈是他所能甘心的嗎？他的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憤的文辭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別愛他的辭，特別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辭與死而增漲了民族的義憤。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註_三之所以產生，以及那個預言之卒由楚人的項梁、項籍而實現，都是這個不甘心的成果。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統一中國的功名和產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兌換了。

但秦人的政治上的成功卻遭了失敗，而楚人的精神上的生產卻收到了意外的成功。由楚所產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產生出的楚辭，無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國統一着的。中國人如果不滅種，中國文如果不消滅，楚辭沒有毀滅的一天。楚人的功勞是不朽的，

屈原是永遠存在的。

註一 見詩大雅綿，詩中的古公亶父即太王，說見孟子。近人顧頡剛先生說他不是太王，其實也沒有細考
究，周人在太王以前的傳說都是後來假造的。

註二 參看拙著卜辭通纂征伐組。

註三 見春秋哀十三年。

註四 參看楚辭概論第三〇頁。

註五 見古籀拾遺。

註六 凡關於古器的銘文，欲知其詳細的可參看拙著兩周金文辭大系。

註七 六具見西清古齋續編甲集，一具見善齋吉金錄。

註八 可參看拙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下冊第一篇。

註九 我有老聃，闕尹，瓊淵一文專論此事。

註一〇 我有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篇論及此事（用日本文發表者名爲天之思想收在岩波書店所發行的東洋思

潮講座中。）

屈原研究

註一一 卜辭通纂第七八八片。

註一二 參看秦天道觀之進展。

註一三 見史記項羽本紀。

屈
原
時
代

關於殷代是奴隸社會這一層近來已得到一般的公認，唯關於周代，則見解尙未能趨于一致。有好些學者認爲周代已經是封建制了，這層是很值得討論的。因爲這個關鍵如不決定，則屈原時代的精神和屈原思想的屬性也就無從決定。故我在敘述屈原時代之前，我要把殷周社會的情形略略討論一下。

向來討論殷周社會的人大都取材于詩經和書經，但詩經和書經這兩部書作爲資料而使用，是有問題的。書經可信的並沒有幾篇，而且都是經過孔門弟子所潤色，自不免要染上春秋戰國時代的色彩。詩經的集成也是同樣，而所染的東周色彩尤爲濃厚。例如以音韻言，國風所蒐及的遍於江河流域，而無地方色彩的懸異，雅頌的時代自周初以至春秋中葉，其間將近五百年，而無時代性的區分，這都明顯地表示着詩經是在某一時分被某一部分人所整齊化一了的東西。古時言『孔子刪詩書』，詩書雖不必一定刪于孔子，但是經過刪改潤色是不能否認的事體。詩書既經過戰國年間的人所潤色刪改，自然會染上刪改人的時代色彩，因此無批判地利用詩經和書經以爲史料，便要成爲問題。

詩書之外，易經成于戰國初年，我已有專文論及。周秦諸子中所散見的材料，自然是可以寶貴的東西，但在那些材料的解釋上也須得經過嚴密的批判。但這項工程我覺得我們做得還不夠。學者於取材上既相當自由，而於材料的解釋上尤多未脫主觀主義的傾向。

例如井田制一事，其說始見於孟子，周官一書雖言之更詳，但周官是有問題的書。孟子雖把詩經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兩句話作為井田制解釋，但並沒有其它的旁證。周代的彝器銘文錫土田和正疆界的紀錄頗多，但毫無井田制的痕跡。故井田制在古時是否存在，還是疑問。小規模的存在大約是可能的：因為在羅馬有相類似的百分田制的古蹟是被發現了。中國將來在河南境內平衛的地方大率也有發現的可能，只要古代是曾經有過。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主張周代是封建制的人却已經把井田制作為莊園之雛形而解釋着，這未免是主觀上的一大飛躍。

主張封建制者的另一種飛躍，便是把周人滅殷，視為如同日耳曼人滅亡羅馬。這同

樣是富于主觀色彩的極端自由的比附。假使要用比附的話，把殷人和周人的關係比于希臘的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的關係，倒要更適當一點。周人在初本是殷人的同盟民族，在傳說是稱爲同祖。就見于甲骨卜辭而言，殷人時常關心周人，屢有「聘周」的紀錄，對于周之首長稱「周侯」，這和日耳曼人與羅馬人的關係完全兩樣。

周人把殷滅了，同時是把殷之遺民化爲了奴隸。封伯禽于魯，予以「殷民六族」，封康叔于衛，予以「殷民七族」，封叔虞于唐，予以「懷姓九宗」。這些六族七族的殷民和九宗的懷姓，自然就是奴隸。有的朋友認爲這是農奴，並引書經上周公對殷人所說的兩句話：「今爾尙宅爾宅，田爾田」爲證，證明這些人都是有自己的家產和土田。其實所謂「宅爾宅，田爾田」者乃宅爾所宅之宅，田爾所田之田，非宅爾所有之宅，田爾所有之田也。照魯國到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來說，西周怎麼也還不能有租稅制，或地主農奴之分。何況奴隸制中也還有種種的形態。例如同希臘，雅典和斯巴達的制度便不盡同。雅典採取的是直接榨取的方式，斯巴達的黑勞士（Heilos），却被束縛於土

地，經營着半獨立性的經濟，而向主人貢獻賦稅。這在表面上頗類於農奴，然而黑勞士依然是奴隸。羅羅社會中的黑骨頭（主）與白骨頭（奴）的關係，也和這相類似。白骨頭娃子營着半獨立性的經濟向黑骨頭貢租，也好像是農奴，然而羅羅社會斷非封建社會也。大抵周人的奴隸多少和斯巴達的相彷彿，倒是事實，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的大陸國家，土地廣大，人口衆多，最宜于黑勞士方式的榨取。周代的黎民，庶民，人鬲等，就是黑勞士式的奴隸，而且是在嚴密的意義上的生產奴隸，和臣妾僕隸奴童奚婢等之為家內奴隸者不同。這種家內奴隸中的高級者可以代表主人管理生產奴隸，演化而為統治者的臣宰，在羅羅社會中的「管家娃子」是也。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孟鼎銘文裏面有一項極可寶貴的資料。那是康王的一位大臣名叫孟的，因為有功受了賞賜，他把所賜之物品紀錄了下來，鑄在一個青銅器的鼎上。那物品裏面的一項是人和臣。

「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邦司和王臣就是管家娃子，人鬲即舊文獻中的「民儀」（古文家誤作「民獻」），這其中包含有「自馭至于庶人」，便是包括着低級的家內娃子和娃子，庶人是居于最下等的。庶人即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所謂「庶人力於農穡」（左傳襄公九年文）。這種人在西周社會的身分在這項銘文裏面是表示得很明白的。這在殷代是稱爲「衆」或「衆人」，甲骨文辭裏面每每見到「王令衆黍于某」之文，又有「王大令衆人曰協田，其受年」的紀錄，「衆」或「衆人」也就是從事於耕作生產的人，故卜辭衆字作「日下三人之形」，也就表明是在太陽下邊的羣庶。「衆人」有時也用來從事戰爭，這是當然的事。因爲古時候並無常備兵的設置，平時的生產者也就是戰時的戰鬥員了。有的朋友把這「衆」或「衆人」說爲自由民，以書經盤庚篇「王命衆悉至于廷」爲證，謂如爲奴隸，如何能參預政議？實則原始民族在有大事發生的時候，整族的成員無間主奴都可以參加會議的。例如羅羅臨有事故時，白骨頭娃子亦須參加全體會議，便是一個證明。而且這「衆」或「衆人」就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中，也有絕好的資料足以斷定它的確是奴

隸。這項資料，便是有名的晉鼎。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王若曰：「晉，令汝更乃祖考司卜事。錫汝赤 \times 芾，旂，用事」。王在 \times 居，井叔錫晉赤金 \times 。晉受休，對揚王。用茲金，作朕文考舜伯將牛鼎。用其萬年用祀。子子孫孫其永寶。

唯王四月，既嘗，辰在丁酉。井叔在異爲 \times 。晉使厥小子 \times 以限訟于井叔：「我既買汝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限許曰：『晉則俾償我馬，效父則俾復厥絲束』，隨效父迺許，曰：『于王參門 $\square\square$ 木榜，用饋誕買茲五夫，用百 \times 。非出五夫， \times 。』迺又饋盤金」。井叔曰：「在王人迺 $\square\square\square$ 不逆付晉，毋俾貳於既。」晉則拜頤首，受茲五夫：曰隕，曰恆，曰隸，曰窳，曰皆。使各以告既。迺俾 \times 以晉酒及羊，絲三 \times ，用致茲人。晉迺誨於既：「 $\square\square\square$ 舍斂矢五乘」。曰：「必尙俾處厥邑，田厥田」。既則俾復命曰「諾」。

昔饒歲，匡衆厥臣廿夫，寇晉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迺曰：「求乃人，乃弗

得，汝匡罰大。『匡迺稽首於晉，用五田，用衆一夫曰益，用臣曰憲，曰臚，曰奠。曰「用茲四夫稽首」。曰「余無直具寇正口黷余。」晉以匡季告東宮。晉曰「必唯朕禾償」。東宮迺曰「償晉禾十秬，遺十秬，爲廿秬。如來歲弗償，則倍卅秬」。迺或卽晉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卽晉田七田，人五夫。晉覓（免）匡卅秬』。

銘文共分三段，首段有『王在周穆王太室』之語，足見乃穆王以後的東西，大約是在孝王時代。第二段所記載的是販賣奴隸的事。雖然文字稍有殘缺，但大意可以明瞭。是名叫晉的人先向名叫限者的家臣效父購買五名奴隸，用一匹馬和一束絲。限中途變卦，叫他的家臣二人（效父爲其一），一人還了馬，一人還了絲。二人又約好了用現錢交易，取價百疋，但這交易又爲限所反對，屢次爽約，故成訟事。我們由這段銘文看來，可以知道在孝王時有奴隸人口之公然販賣，而交易形式是兼行着實物交易與貨幣交易的兩種。實物交易時五人的奴隸只值得馬一匹和絲一束，便是五個人的價值僅僅抵得

上一匹馬。貨幣交易時五人合僮百牛，一人值二十牛。僮字當然是貨幣的意思，金文中常見，音讀不可考，時常是以牛爲單位的。各卽銘字，漢以來又往往誤爲鍤。這個字經我的考證是有兩個系統的，用爲貨幣單位時是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用爲衡量單位時是重六兩或六兩大半兩（「大半兩」卽三分之二兩）。這兒是用作貨幣單位的，應該是前者。一人值二十牛，用漢時的五銖錢來合算時，一個人只值得四十六文錢。

銘文的第三段是以奴隸來贖罪的事。是在一年饑饉的時候，有一位名叫匡季的人率領他的奴隸二十人去偷了晉的禾十秬。晉使向王官名叫東宮的去告發了他。匡甘願「用五田，用衆一夫，用臣三人」來抵償。但晉仍不滿足，要他非償還禾稻不可。東宮便叫匡「償十秬，遺十秬，爲廿秬，如來歲弗償，則倍卅秬」。匡却又加上二田和一臣來私下了結，一共賠了七田和五人，而晉也就免了他的罰禾卅秬，原禾的十秬當然是追回了的。據說文，知道「五稷爲秬，二秬爲秬」，又據儀禮聘禮，知道「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秬是半秬，當二百秉。「秉者把也，謂刈禾盈一把也」。

（鄭玄說）三十秭則爲六千把。匡甯肯出七田五夫而不肯出六千把禾，可知七田五夫必比六千把禾賤。禾一把可取米一合之譜，六千把僅取米六石。六石米之價竟在七田五夫之上。五夫若值馬一匹絲一束，或鬻百鎊，七田不知當值幾何，但七田每年所出必遠在六石以下。五夫各夫所值亦必遠不及一石。古代田積之小與人價之賤，實在足以驚人。

像這樣任意用來和馬匹、絲束、錢鎊、禾秭交換或抵償的「臣」和「衆」，除解爲奴隸之外，實在沒有第二種的解釋。「臣」很明顯的是家內奴隸，「衆」便是生產奴隸了。由後以例前，可知殷代社會已經是奴隸制，而西周是奴隸社會，也是毫無問題的！

奴隸制度在西周末年厲王奔皖的那個革命的插話上便在開始動搖，但它的根蒂就在春秋中葉都還依然存在。在這兒有北宋宣和五年在臨淄出土的叔夷罇及叔夷鐘（舊稱齊侯罇鐘）是絕好的證明。那是齊靈公十六年（魯襄公七年，西紀前五六六年）的器皿，叔夷在靈公十五年滅萊之役有功，受了齊侯的爵賞，便作器以紀其事。那在金文中是很堂皇的一篇文章，長約五百字，其中有兩句是：

『余錫汝釐都××，其縣三百，造國徒四千，爲汝敵寮。』

『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作。』

孫詒讓會考定出註「釐就是萊（古音讀萊如釐），那是確切不易的。我們由這兩句看來，可以明白地知道，萊被齊滅後，他的國土成爲了齊的郡縣（注意：郡縣制並不始於秦），他的人民成爲了齊的奴隸。所謂『敵寮』者，敵通嫡，是直屬的意思。寮便是『隸臣僚』的僚，於四千的『嫡僚』之外又有二百五十家的『釐僕』，也就是『僚臣僕』的僕。這奴隸制的規模，不能不謂爲宏大。

總之，在殷代滅後，中國的社會曾互歷過幾百年的奴隸制度，由上舉的一些證據看來，凡是稍有科學的常識，不爲先入見所困的人，是不能夠否認的。

知道西周乃至春秋時代是奴隸制，對於自春秋末年以來至嬴秦混一天下（西紀前二二一）爲止的三百年間，中國文化的那個燦然的黃金時代，在社會史上的意義便可以迎

切而解。那個黃金時代的意義不外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移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應。
屈原是生於這個時代的後半期的人（西紀前三四〇——二七八），他和他的作品之社會
史止的意義也就和浮雕一樣呈現了出來。

我們要曉得周人在太王以前本是沒有多麼高度文化的後進民族，他們把殷朝的宗主
權劫奪，把殷民族的大部分奴化了，同時把殷人的文化承繼了下來。但他們的承繼是有
統制的承繼。在周人統制下的殷人雖然陷到了臣僕的境遇，但他們本來是文化上的先
進，這層我們是不要忘記的。他們在周人的文化統制之下隱忍了幾百年，在春秋末年他
們又抬起了頭來了。承繼着奴隸宗主——周室之衰落和「世卿制」之逐漸廢除，應運而
起的「執命」的「陪臣」與「橫議」的「處士」，不外是卓輿之流之高級者或地主化了
的卓輿。文化的主體由後進的君子轉到了先進的野人，由統治階級轉到了被統治階級。
當時的兩大學派的領袖孔子和墨子都是宋人而居於魯者，註二他們這些人物，由周人的
立場上說來，都是奴隸的子孫。近人有解釋墨子之墨為刺墨之墨的，註三則墨十還是刑

餘之人。儒家稱道堯舜，主張「有德者必在位」的哲人政治，墨家祖述夏禹，提倡尚賢尚同，兼愛非命，在當時都是反貴族的革命思想。他們都不認周人爲絕對的權威，要在周人所誇耀的文武之上提出些偉大的傳說人物來。他們所用的表現思想的工具也是當時的白話，這是應該注意的。凡用焉哉乎也爲語助的這種文體，在現今看來雖是文言，而在春秋、戰國時却是白話。周人的臺閣體的文字如誥、命、雅、頌以及金文，焉哉乎也的語助幾乎是絕對不使用的，到了春秋戰國便猛然一變。那時候的文體的變革和近代的文學革命，由文言文改爲白話文的，實在是毫無二致。

屈原本是楚的貴族，和孔墨在北方居於野人的位置者不同。但屈原後於孔墨一百餘年。北方的奴隸解放運動和其意識上的新銳的革命思潮是已經蕩到了南方。屈原在思想上是受了儒家的影響，堯舜等一個系統的幻想人物以及由那些幻想人物所化演出來的哲人政治的理想，他是完全接受了。而他在文字變革方面尤爲接受得徹底。他把那種革命擴展進了詩域裏去，他徹底地採用了民歌的體裁來打破了周人的雅頌詩體的四言格

調，徹底地採用了方言來推翻了雅頌詩體的貴族性，他在詩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他有敏銳的感受性，接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更加上他的超絕的才質和真摯的努力，他的文學革命真是得到了壓倒的勝利。氣勢和實質都完全畫出了一個時期。我們如把近代的文學革命家，往往進一步便退兩步的，和屈原比較起來，便可以感覺到屈原的偉大，而我們自己真是可以慚愧得無地自容。屈原的文學革命只有前進，沒有倒退，像雅頌體的四言格律的詩，他當然是會做，然而他至死都把它摒棄了，堅守着自己的風格，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徹底地創立了一個體裁，這樣的氣魄實在是值得我們後人追慕而效法的。

屈原委實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時代也真正地玉成了他，但他的資質却給與了他一個很大的限制。他以貴族的身分能夠接受奴隸解放的時代潮流，能夠把民衆的歌聲提升到清廟生民之列，但他在詩域以外的現實世界裏卻沒有力量來領導時代。

他的遭放逐是應該在襄王七年或其後的一二年中，楚懷王被秦人詐騙了去，囚死了，是在襄王三年。其後三年之間秦楚斷絕了關係。註四到襄王六年秦將白起伐韓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人乘勝來威脅楚國，要與楚國決一雌雄，襄王受不過威脅又才和秦人講和，到第二年更做了秦王的女婿。屈原始終是主張絕秦的人，他在生涯中所受的徹底的打擊，就應該在這前後的幾年內。

他被逐的地點是在漢北，期間有十四年，直到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侵略楚國，把楚國的郢都破了，取了洞庭、五湖、江南，逼得楚國君臣倉皇奔走，東北保於陳城。屈原自己也從漢北逃到江南，做了哀郢、涉江、懷沙、惜往日諸篇，便終於在汨羅自沉了。他能夠自沉是他『行己有恥』，是他的人格過人，不像後世有好些文人一遇着威逼便忝顏舉仇而歌功頌德。但他既有自殺的勇氣，爲什麼不把當時的民衆領導起來，向秦人作一殊死戰呢？以楚人對於秦人的敵愾，以他的得楚人的信仰，他假如是有實際家的手腕，我相信楚人一定會服從他的領導，抵死地和秦人抗爭。事實上這種抗戰之零碎的

表現，雖然史籍上沒有記載，在當時一定是相當猛烈的。譬如，我們試問，白起既取了洞庭、五湖、江南，何以又把它拋棄了？楚國的那些地方何以直到後來才爲秦人所吞併？這，決不會是秦人的講人情，也不會是白起的講戰略，一定是楚國的民衆間所蜂起的巴爾奇山式的抗戰，阻止了白起的銳鋒或則擾亂了他的後路，所以白起雖然得到了那樣壓倒的勝利而終於沒有立即把楚國覆滅。這兒正足以見到民衆的力量！屈原雖然愛憐民衆，但他卻沒有本領來領導民衆。他被放逐在漢北的十四五年，詳細的生活我們不知道，他似乎始終是成爲了憂鬱底囚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君，是當時的一般執政者，是自己的懷才不遇。十幾年的一肚皮的牢騷終只好讓一死來爆發。他只認識在上的力量，而不認識在下的力量。這兒如其說是時代限制了他，甯確實是資質限制了他。他假如是有實際家的本領，在那被放逐的十四五年間便應該有些準備。在這兒令我們想起了後於他六七十年的他的同國人的項梁來，讓我現在且揭引一段史記項羽本紀的文字在下邊吧。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西紀前二二四年）者也。……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

我們請看這位項梁，他的準備和部署，是怎樣呢？他處在秦人的嚴刑峻法的統治之下當然沒有屈原所處的時代那樣自由，然而他早把下層的力量認定，而且組織得頭頭是道了。我們再看他聽從范增的計劃，尊重民意，立楚義帝的一節吧。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爲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把這些時代相去不遠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步驟來和屈原比較起來，他們的態度便全然兩樣。實際家能夠領導民衆，組織民衆，詩人，其進步者如屈原，竟只能感受着民衆的氣勢而呼號，在實踐上則在時代的邊際上徬徨。

屈原根本是一位詩人，他的失意正是時代對於他的玉成。假使他不是詩人，他一定不會失意。朝消極處說，只要他能夠「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卽是「幽默」得一點，他一定可以「從俗富貴」，何至於失意？朝積極處說，只要他能夠「悃悃款款，誅鋤草

茅』，如項梁一樣早作準備，他一定可以『與騏驎亢輓』，更那有功夫來失意？但假使他是不失意，他後期的作品是不能夠產生的。僅僅是他的前期的一些作品，決不能在文藝史上造出一個時代來。他如順當地做一個富貴人下去吧，即使他就做到了楚國的令尹，我想他的品格是只能夠做到溫文爾雅的太平宰相；或者終老在他的左徒的位置，做得一個漂亮的外交官，如此而已。時代對於他真是特別的厚待，他既稟賦有充分的詩人氣質，而使他處到了國將破家將亡的境遇，玉成了他成爲一個空前而且恐怕絕後的偉大詩人。

我對於屈原的詰難，問『他既有自殺的勇氣，爲什麼不把當時的民衆領導起來，向秦人作一殊死戰？』或許有人會以爲有點出軌，會以爲即使屈原在當時把民衆領導起來，赤手空拳也不會把白起的兵力如何。或許更會以爲屈原是有先見之明，看到了這樣的無可如何，所以才自殺了。因此我的求全之毀，我的僅僅把屈原看成爲一個詩人，恐

怕有點不合實際。在此我須得還要補充一番意見。

我們要知道，屈原的那個時代也正是中國的青銅器時代向鐵器時代遞禪着的時代。中國古代的兵器，除開石器時代的遺品之外，都是用青銅鑄的。秦初的呂不韋現存於世，也是青銅。鐵在初視爲賤金，只用來做工農的用具。到戰國末年才漸漸有鐵兵出現，而且始于楚國。荀子議兵篇上說『楚人宛距鐵鈍，慘如蜂螫』。史記范雎傳載『秦昭王曰吾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凡此均足證楚國始發明鐵兵之使用。戰國末年爲奴隸制與封建制的交換樞紐，同時也爲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的交換樞紐。知道這層才可以明白秦始皇吞併了六國之後，何以他要『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註五而陳涉吳廣等一些農夫牧豎何以便能夠『鋤耰棘斤，因利乘便』？原來秦人所銷的是廢銅，而陳涉吳廣等所使用的的是鐵器！

這些議論早就由章鴻釗氏所揭發了，註六但我最近發現了一項史實，知道了銷兵鑄

器的事，不始於秦而始於楚。

已經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了。那年的夏間安徽省壽縣的東鄉朱家集的李三孤堆，因淮水汎濫，發現了古物。後來該地方的人便秘密開掘，獲得銅器石器共八百餘件。其中有幾個器皿的銘文上發現了兩個楚王的名字，一個是熊肯，一個是熊忤。壽縣本是古時的壽春，是楚國最後的都城，是襄王的兒子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的。所以熊肯大約就是考烈王熊完；而熊忤即考烈王的兒子幽王熊悍，是毫無可疑的。現在且說有熊忤的名字的幾個器皿吧。

有一個是鼎，今藏定海方氏；在蓋脣和器脣外沿各有一道主銘。（副銘從略。）

蓋文是：

『楚王熊忤戰隻（獲）兵銅，正月吉日，作鑄喬鼎之盍（盍），以共載棠（蒸嘗）。』（器文無『之盍』二字。）

還有一個是盤，今藏北平圖書館，在脣沿上也有一道主銘。

『楚王熊軫戰隻兵銅，正月吉日，作鑄少（炒）盤，註七以共載棠』。

兩個器皿不用說是同時做的，所謂『戰隻兵銅』的事，據我的考察，大約是在幽王三年。史記楚世家於幽王三年載『秦魏伐楚』一語，又六國年表於同年秦魏欄內載其事，秦言『發四郡兵助魏擊楚』，魏言『秦助我擊楚』，但都沒有說到誰勝誰負。幽王在位十年間，此外是沒有戰事的記載的。由新舊史料的合證，可以知道幽王三年的戰役是楚得到了勝利，把秦魏的聯軍打敗了。打戰是在三年，鑄器是在正月，所謂正月當得是四年的正月。同時所鑄的器皿，由副銘上所勒的工名看來，很是不少；因此也可以知道所獲的兵銅，也相當地多。但最該注意的是把兵銅銷毀了來鑄造器皿！可見銷鋒鑄器，並不是秦始皇的倡始。楚國得到了兵銅，不把它作為兵器使用，也可以見得在幽王時代楚國已經在用鐵兵。

幽王四年上距屈原之死僅四十二年，幽王時已經在用鐵兵，那麼屈原時代的楚國的工農所用的鋤斤一定是鐵器。使用銅兵的白起所將的秦兵，攻破了楚國的鄧都，並奪

取了洞庭、五湖、江南而終於拋棄了的，不是楚國工農的鐵器在那兒說話嗎？在那時有那樣英勇的工農，屈原在他被放逐的十五六年間如早把他們組織起來，不是很大的力量嗎？如果屈原真是那樣的實際家，秦楚的爭霸真真是未知鹿死誰手？中國的歷史上或者也可以免掉呂政和項羽那兩個不學無術的狂人所演出的摧毀文化，活埋民衆的萬世不能磨滅的國恥了。

總之，屈原他是一個詩人，他在詩域內的成功是時代玉成了他，但他的成功已經是足以不朽的。

註一 見孫警古箱拾遺上卷。

註二 史記孟荀列傳和漢書藝文志言墨子爲宋大夫，葛洪神仙傳、抱朴子、荀子身符楊注及元和姓纂均言墨子宋人，獨呂覽慎大篇注以爲魯人。孫詒讓採後說，我看當和孔子一樣，本是宋人而居於魯。

註三 錢寶四說，見古史辨第四冊序。

註四 此前後事跡見史記楚世家。

註五 水經注卷四載「秦始皇二十六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沔，長五丈餘，以爲善祥，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

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錄其胸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宮前，俗謂之「翁仲」矣。「今案身長五丈，足六尺，當是金人的長度，後人誤以爲長狄之長，天地間不應該有那樣的長人。」

註六

見章箸石雅末附中國銅器時代表。

註七

少字或釋爲小，但觀其盤制實如今之鑄，與備盥洗用者不同，故余釋爲妙。

風原研究

屈
原
思
總

侯外廬先生的『屈原思想的秘密』，我過細拜讀了，受益不淺；同時他還有『祝賀』我的意思，我尤其感謝。關於屈原的思想，我在以前所寫的研究屈原的一本小冊子中本來早有敘述，但那書在坊間很難找到。最近雖曾作過兩次講演，又因時間關係，對於思想這一部分，卻未能展開。現在讀了侯先生的大作，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鼓舞，因此我想把我所懷抱的見解，重新來敘述一遍，以就正於侯先生及對於屈原素有研究的同好。

侯先生認為屈原的思想有矛盾，而『這一秘密是歸結到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間的矛盾』，這個斷案是相當正確的。但他把屈原來和民國十六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對比，又和法國的巴爾扎克與俄國的托爾斯泰對比，這兒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是近代歐洲文學的寫實主義的巨匠，他們在方法論上是進步的，然而一則擁護王權，一則篤信神祕，在世界觀上是偏於保守。這個矛盾，在現在已經成爲了周知的事實，不成問題。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極合乎科學的律令，他也確實是得到了空前的收

獲。而他卻自命爲勝濟的准遺老，終於跳水以殉，博得一個『忠愍』的諡號，這卻明白地表示着他的思想的落後。他的死，正是這種矛盾的一種消極的解答，也是毫無問題的。但要說屈原的死也和這是一樣，方法論是前進的，『求真的』，世界觀是落後的，『本質上反動的』，那卻不免大有問題。我的看法，卻正相反。屈原的世界觀是前進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爲詩人在構想與遣詞上的技術——卻不免有些保守的傾向。這便是我所認識的屈原思想的矛盾，結論的形式雖然和侯先生所見到的相同，而內容則恰恰相反。如要展開這個問題，在步驟上卻非把中國古代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發展，從新展開一遍不可。

中國的古代，在殷以前大抵是民族社會——我說是大抵，因爲在這一個時代我們只是出於推測，並沒有充分的實證。殷周時代確實是奴隸社會——我說是確實，因爲在這個時代我們得到的確證很多，是不會成爲問題的。雖然現在也儘有人還在說周朝是『大封建時期』，或者又有人說『中國沒有奴隸制度』，或『奴隸制度未完成即已蛻變』，

但這些都是由於認識不足，研究的沒有到家。假使那些人再充分的研究一下，把認識充足起來，我相信在不幾年之內終竟是會改變的，只要是真正地抱着科學家的態度，而沒有成見的人。

爲什麼說殷周是奴隸社會？因爲當時是在用大規模的奴隸來從事生產，也就是說當時有大規模的生產奴隸。關於生產奴隸的有無這一點，近來也還是有人認爲並未論定。中國人做學問，大抵都肯在名詞上用功夫。譬如說『封建』吧，他首先就把那一套『諸侯建同姓』的舊觀念在那兒盤旋，古時是說夏殷周爲封建期，現在讓一點價，把夏殷趕出去，把周代保留起來，卽作爲『諸侯建同姓』的『大封建時期』。他就不問問，究竟我們現在所說的封建制的本質是怎樣，周朝的生產又是怎樣。又譬如說『奴隸』吧，大家便只在奴隸字面的文字上去找奴隸社會，把說文解字乃至康熙字典翻交，所能找到的臣妾童奚奴婢以至隸僕臺輿等等，找來找去都只是一些從事服御的家內奴隸。做了這一段工夫的人，認爲中國古代是只有家內奴隸，沒有生產奴隸，所以他們會說中國沒有

奴隸制或奴隸未完成便起蛻變。然而他們却沒有想到中國古代的生產奴隸並沒有用臣妾、奴婢、隸、僕、臺、輿等字面，而是稱爲人、庶人、小人、民、庶民、黎民、黎、羣黎、鬲、人鬲、民儀、民獻等等的。生產奴隸一解放了，這人民黎庶等字樣跟着起了蛻變，失掉了奴隸的含義。要研究中國古代而不注重在這一層，不注重生產者的性格，而只是在文字字面上探求的話，那是永遠找不出生產奴隸來，同時也就是永遠闡明不出中國古代社會的面目。

我說中國古代的生產奴隸就是人民，早在十三四年前。因爲在西周時代的資料特別多，足以證明西周的人民就是生產奴隸，故我堅決地斷定西周是奴隸社會。殷代我沒有得到多少直接的證據，故我起初多少還有點游移。西周以後呢？便已經在開始蛻變，故我把春秋戰國時代認爲過渡。許多反對我乃至痛罵我的人（在研究文字中動輒愛罵人是浪漫，狂妄，或甚於此的話，十幾年來我領教了不少），硬要說西周不是奴隸社會，而都不大注重人民就是奴隸這一點，實在是一件驚人的事。驚人的，是我感嘆着，文字這

項符籙束縛着思考力的權能竟會有這麼偉大！我現在要懇切地請求，請求大家把這個論點注意一下，如說這個論斷是不可靠，那就請提出反證來。

殷周時代的人民地位是在家內奴隸之下，是人中的最下等。例如左傳昭公七年楚國的芋尹無宇說的『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從事牧畜生產的圉牧是在十等人之外，而還沒有提到從事農耕的人，這種人當然也是十等人之外的。又例如康王二十三年的大孟鼎銘裏面有這樣的話：『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於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汝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這些臣人是和衣履車馬一道錫予的，所謂『邦司』就是管家，所謂『夷司王臣』也就是管理夷僕的王家管事，就是管家娃子，故爾被錫予而位在『人鬲』之上。『人鬲』究竟是什麼？好在他的內含已經明白表示着是『自馭至於庶人』。馭不用說就是十等中的與，而庶人在此是居於最下等。

再把『人鬲』解釋一下吧。鬲字讀歷，漢朝的人又作『厯』，從瓦厯聲（見說文）。

好些人把它讀成隔，是讀錯了的。這本是一種三個空脚而形頗似鼎的器皿，就是後世鼎鍋的祖先，鼎鍋下面還有三個小乳頭形的脚，就是那三個空脚的退化了。以鬲字作爲人民身分的一種稱呼是出於假借，除大孟鼎之外，還有周成王時的令簋，那銘文上說「姜賞令（人名）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也有「鬲」這種人，而地位在臣之下，與貝朋之類同爲賞賜的物品。這種稱謂除彝器銘文之外，文獻中沒有見過，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只是用的字面不同罷了。例如逸周書世俘解上說「武王（克殷），遂徵（征）四方，凡懲國九十九國，滅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裏面的磨字就是鬲的同音假借字了。這不是磨。請不要認錯。我們根據這項資料，可以知道鬲的這種稱謂在文獻上也有，而鬲這種身分的人在殷代已經存在，而且爲數甚多。足見殷代已經是奴隸社會。其實鬲字也就是黎民的黎，民儀的儀，都是同音假借字。古時候同音的字便可通用，這是表明中國文字在發展過程中雖以表形爲主幹，而亦時有表音的支流。要曉得「同音通用」這個通例，有許多古書才可以讀，中

國的訓詁之學也就是建立在這個通例上的。黎大概是中國（主要是南方）的先住民族吧，古人『命九黎之人曰民』（見呂刑鄭注），即是說把黎民族滅了，使它成爲奴隸。這黎人現今在海南島上還有一部分存在。古時的『九黎』應該就是『子欲居九夷』的九夷。這九夷的名目在後漢書東夷傳上有詳細的記載。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侵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武乙以前的情形，在地底資料上雖然沒有得到直接的左證，但在武乙以後的情形，則甲骨卜辭中關於殷人征伐夷人的記錄極多。就我們所研究到的結果，知道帝乙時代曾經屢次大規模的征伐夷人。（卜辭作爲『尸方』，尸與夷古字通，古本作尸，後人改作夷。作尸者似猶今人稱外國人爲『鬼子』也。）而用兵的地點亦多在淮岱，與古史相證合。殷紂王與東夷的關係，在左傳上保留有幾項資料。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四年楚椒舉語。)

『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昭十年叔向語)。

可見紂王時代又曾討伐東夷，而卒至把它征服了。征服了的結果，便是這些夷人或者黎人化爲了奴隸。故爾古本泰誓上說『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周武王自稱）有亂（司）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見左傳昭二十四年。今本泰誓中有相類之語而大同小異，但今本泰誓乃僞書。)夷人爲殷所有，是被用來從事生產或當兵。當兵的結果，故惹起『前徒倒戈』的悲劇，便是俘虜兵掉頭，或奴隸叛變。在古代民族觀念極盛的時候，族與族之爭，每致整族淪亡亦不惜，不是俘虜兵是決不會有『倒戈』的現象的。今世未開化民族之爭執及開化民族中之『械鬥』亦可爲旁證。殷人用奴隸來從事生產，在下辭中頗有證據。卜辭裏面每見『王令小臣某挈衆人黍於某』的辭例。小臣就是管家娃子，『衆人』就是所謂『庶人』，所謂『黎民』，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了。故爾殷代，至少在其末年，確實是到了大規模的奴隸生產時代。而這些奴隸的來源大抵

就是夷人或者黎人。故這些奴隸便稱爲『黎』，或者『鬲』，或者『人鬲』。書經上的『民獻有十夫』，今文作『民儀』，其實也就是『人鬲』。獻字是古文家認了別字。因爲獻這項古器，是在鬲之上更加一層甑，其象形文（小孟鼎銘中有之），與鬲實相類，古文家認不清古字，便把它讀錯了。然而根據大孟鼎銘，『人鬲』實家內奴隸與生產奴隸的統稱，生產奴隸的『庶人』是居在最下位的。又根據世俘解，『馘磨』與『俘人』對稱，亦足以證明『磨』是兩種奴隸的統稱，而『人』便是庶人了。在這裏面庶人自佔大多數，故到後來黎民與庶人漸漸就等於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去了。

何以知道庶人就是生產奴隸，根據卜辭的『衆人黍於某』的記載已可以證明。我們再引證左傳上的資料，更可以得到明確的概念。

『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襄九年楚子襄對於晉國的評語）。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襄十四年晉師曠語）。

『克敵者：下大夫受縣，上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遂是進級之意），人臣隸圉免』。（哀二年晉趙鞅誓師辭）。

根據這三項資料，我們更可以知道，『庶人』就是從事農耕的。這是我們中國這種大陸國或者農業國的主要的生產者。這三項資料都是春秋末年的情形了，在這裏面尤其值得使我們注意的是庶人的地位生了變化，而品質也生了分化。由庶人之中生出了工商的新階層，庶人被提升到貴族或奴隸主之下，家內奴隸之上去了。在初本來是不入等級的最下等的人，却被提升了地位，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所說的是什麼？便是說明生產方式起了變革。而庶人漸漸由奴隸以下的地位解放了出來。研究古代史的人，在這些地方是應該特別把眼睛睜大些的。

中國是在溫帶中的大陸國，也就是大農業國，有的是土地，有的是人。在這種物質條件之下，便馴致了奴隸解放的機運，也可以說是馴致了一種中國形態的由奴隸制轉化

爲封建制的方式。這是轉化得很迂緩，很自然，而沒有採取十分劇烈的革命形式的。自大氏族制解紐以後，由大宗而小宗，而別宗，土地與人力均生出分割，由大集團的共有成爲各個小集團的共有而仍統轄於公。各個小集團利用有餘的人力去開拓有餘的土地，於是在公有土田之外便生出私田，所謂『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生出來的，那並不是如孟子所解釋『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的意思，更不是近人所解釋的莊園制的雛形。土地再分割，人力再加榨取，所分割者愈小，所開拓者愈大，便形成私肥於公的形勢。於是公權下移，王綱解紐，逐漸鬧到政逮諸侯，政逮大夫，政逮陪臣的地步。生產奴隸的庶人，他的生產價值被人認取了，在各個所有主之間被人互相爭奪誘致，於是他的地位也就不被提高了。而生產奴隸本身也可以利用其剩餘勞力開拓有餘土地，或利用別種資料而形成爲工商階層，自己本身也逐漸地偷渡到富庶的地步。他也可以自備家內奴隸或甚至生產奴隸，便是娃子又有了娃子，所以庶人地位便超在了卓隸之上。這便締結成奴隸解放，奴隸解放者非家內奴隸免籍，

乃是生產奴隸蛻變，這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這個蛻變時期，大抵就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地大，各地的發展情形並不平衡，因而各國的蛻變時期有先有後，以中國爲單位來說，則前前後後合計經過了三四百年，但如以各個的國家爲單位來說，那情形又稍有不同。春秋列國之中，大抵齊國蛻變得比較早，它是靠官山府海的工商業而興起的，情形特異。其它各國在農業的生產方式上所可考見的巨大的變革，例如魯國在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這似乎是農業革命的最早的一例。在古公田時代，是無所謂稅賦的，公田所產，由公家籍之，即是全部生產均歸公家，生產者由公家所飼養而已。待到私肥於公，則公家所入實微乎其微，故不如泯却公私，承認私有，而一律採取賦稅制。這樣，則公家的收入，比專靠公田所入者會要大。必定要大得多，才會採取這種變革的。在魯國，雖然宣公十五年已『初稅畝』，然到一百一十二年之後的哀公十二年又才『春用田賦』，大約在制度開始改革之際，阻礙橫生，其間是有過一長段沒有行通的時期的。

在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有楚國改革田制的資料。『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潏、町原防、牧濕臬、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藉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又在襄公三十年有鄭國改革口制的資料。『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這項資料把制度變革時的一般人的動態，表現得極其簡明而生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所謂『與人』，那便是十等人中的第六等的家內奴隸，而他們公然有私有的『田疇』了。把這些私有的田疇通登錄起來，承認它的私有而分別徵稅，更把奴隸主的所謂『大人』，加以甄別淘汰，好的也聽其私有，不好的便索性殺戮。子產這位政治家，在當時一定有好些人罵他爲『過激派』，故大家都想『殺』他。然而經他一改革，才僅僅三年，便大家都歌頌頌

德了。足見得舊制度已經十分腐爛，早就到了非變革不可的地步。

到了戰國時代，魏文侯時的李克，亦即李悝，有盡地力之教使魏國富強，其詳不可得而聞。傳其衣鉢的有吳起與商鞅。吳起行之於楚，『捐小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而使楚國強，但遭了『貴戚』之衆怒而被『宗室大臣』射死。商鞅行之於秦，『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秦國因之而強，亦受『宗室貴戚怨望』而遭車裂。這兩位革命的政治家（吳起雖僅以兵家名，其實他是長於政治的），雖然同以悲劇終結但他們的法術的行與不行，便規定了秦楚的運命。秦國用商鞅之法而卒至兼併天下，楚國廢吳起之法而終于絕滅。關於秦楚的對比，在楚襄王二十一年曾經攻下楚都，焚其宗廟，逼楚國東遷的秦將白起有一段極有史料價值的話，見戰國策卷三十三，中山策的最末一篇：

『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掎城邑，發梁

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軍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鬥志。是以能有功也』。

不媿是一位名將說的話，他沒有把戰爭的勝利純全歸之於軍事的勝利，而是把它和政治動員的情形嚴密地鉅繫着的。楚國鬧到『諂諛用事，百姓心離』的實況，不是足以證明吳起之法是掃地無存了嗎？

由以上所述，可見中國的古代社會在春秋戰國時代確實是進行着一個很大的變革，即便是由奴隸制逐漸移行於封建制，而這個變革的完成是在嬴秦兼併天下以後。秦以前和秦以後的中國社會，完全是兩個面貌，這是毫無問題的。

有了這樣的社會變革，自然在意識形態上便生出極大的反映。首先是人民的價值生了莫大的變易。以前是人民與六畜同科的，例如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又『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珍異』，人民與六畜牛馬同爲販賣

品。甚至人民的價值連牛馬亦不如，孝王時代的『晉鼎銘』，載明晉這位先生曾以一匹馬和一束絲去掉換五個人（在那銘文中連這五個人的名字都是揭載着的），足見五個人的價值僅僅超個了一匹馬。這人民的價值是多麼賤！然而到了戰國時代却發生了『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的議論了。

因爲人民的價值提高了，故爾倫理思想也發生了變革，人道主義的思潮便澎湃了起來。儒家倡導仁，道家倡導慈，墨家倡導兼愛。這都是叫人要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特別是在上者要尊重在下者的人格。以前在氏族制時代是把人當成犧牲（卜辭中還多以人爲牲的紀錄），在奴隸制度時代是把人當成牛馬，現在是要求把人當成人了。把人當成人，便是所謂仁。這個仁字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新名詞，在卜辭及金文中沒有見過，就是在春秋以前的真正的古籍中也沒有見過。這個字的出現，是當時的一個革命的成果，我們是應該把它特別看重的。事實上當時的儒墨道三家的整套的倫理思想的出現都是革命的成果，我們不可以拿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的眼光去看，要辨證的從歷史的發展

上去看。不能說在現代這些思想有一部份是落後了，而公式的地斷定這些思想本質的地便是反動的。

更其次是政治思想發生了變革。保衛人民的德政思想成爲了普遍的潮流。在消極方面反對不義的戰爭，反對不義的刑戮，反對世卿制度，而在積極方面則主張『尙賢』，主張『有德者必在位』，主張『爲政以德』。而爲統一全中國起見，極力主張消弭各個氏族集團的個別的傳統，特別是個別的氏族傳統，而倡導出整個中國民族的大公祖以爲統一的基點，道家捧出黃帝，儒家捧出堯舜，墨家捧出夏禹，都是這個用意。這黃帝堯舜的出現，我們是不可輕略看過的。在以前，各個氏族集團各有它的小公祖，例如我們在卜辭中所見到的殷代祖先只有上甲王亥高祖夔（王國維謂卽帝嚳）諸人，周代金文中數到的周人祖先只及文武，周詩中也只見到公劉，太王，后稷，唐堯虞舜是連痕跡都沒有的，不用說更古的黃帝了。故爾黃帝堯舜的出現，在當時也實在是革命的出現，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企圖泯却各族的差別觀，而在政治上求得中國的大統一。

更其次是地上的思想反映到天上，地上的世卿制既遭反對，地上的王位既輕於民位，則天上的唯一神——地上王的影子——也就發生了動搖而模糊起來了。在氏族制時是萬彙皆神，在奴隸制時是萬物一神，而到春秋戰國時代則成爲『民者神之主』。中國的唯一神觀念——上帝，是創生於殷代，卜辭中已有上帝的名稱出現，在周初雖曾略見動搖，但不久仍穩定如故。自夷厲以後，神便大倒其楣，變風變雅中常受詩人責怨，而到春秋末年以後，更幾乎完全消失了他的存在。周秦諸子中除墨家尙承認有人格神之外，道家便主張只有一個無形無影的『道』，是超越空間時間，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似虛而又非虛的一種實體。儒家則主張只是一個理，也就是變化的道理，宇宙中就只有變化，由一個陰陽剛柔之對立而生。這變化有時謂之『易』，有時亦謂之『道』，在便宜上亦謂之『天』，亦謂之『神』。事實上道儒兩家都是無神論者。這個變革怎麼也不能不說是天大的變革。

更其次是整個的智識下移，文字藝術一切都生了變革。我們知道古代的智識是爲貴

族或奴隸主的專有品，除王室公室乃至王室公室中少數史巫之外，一般的人民都是無智識的文盲，故爾古人說：『民者盲也』，或者說：『民者冥也』。知識爲貴族的專有品，一切的文字藝術文物禮節都是貴族的專有品，所謂『禮不下庶人』，便是文化化不到奴隸身上去。然而在春秋戰國時代。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儒道墨的大師雖然多是世族出身，而他們的弟子則多是庶人。而且人數之多出人意外，孔子的及門弟子便有三千，單是他的弟子澹台滅明的弟子也有三百，戰國時齊國的田駢『營養千鍾徒百人』（見戰國策齊策），都是很興旺的一些讀書幫口。所以孔子以一沒落的流亡貴族，而他的弟子們尊之爲『素王』，實在是巍巍乎有王者的氣象。

文字的變革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類自有文字以來很快的便爲貴族所壟斷而成爲神祕的工具。因此一切古代的文字都和民衆有很大的距離，和民衆的言語有很大的距離。文字異常的簡單，異常的奧妙，異常的定型化而類似於化石。這是有政治上的必要的，因爲愈要和人民脫離，才愈顯得神祕；愈顯得神祕，才愈使人民難於接近而易於壟

斷。但是人民抬起頭來了，智識既不能不下移，容載智識的工具更不能不要求其通俗化，故爾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文體便生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我們請把卜辭、金文、訓詁雅頌拿來和周秦諸子的文章詩歌比較一下，便可以立地知道這其間的懸隔。散文則有焉乎者也的話，助文體出現了，這是在前所沒有的。詩則有國風的民間歌謠的蒐集，雅頌也大有不同。一句話歸總，便是文字逐漸語體化，大衆化，在這時，的確是有一個文學上的大革命。

以上便是春秋戰國時代，應着社會的變革，由奴隸制至封建制的變革，而生出的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即思想革命。屈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將近末期的，我們請更進一步來檢討他的思想，看他究竟是不是反動，是不是『本質的反動』。

屈原思想很明顯地是帶有儒家的風貌。這種見解倒並不始于我，古人早已就有見到的。例如淮南王劉安說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其志足與日月爭光。（語出劉安『離騷傳』，今佚。爲史記屈原傳所採錄，據班孟堅序知是劉語。）王逸更引伸之，謂『離

騷之文依五經以立義』。(見王注離騷序)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亦謂『取節經義，自鑄偉辭』。降聖前清的戴東原，也說『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見戴著『屈原賦注』序。)這些舊式的學者於引證上雖然都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之處，但斷案並沒有錯的。最好我們從屈原作品中來檢查一下，看他有些什麼思想，究竟和儒家是不是接近。

第一我們感覺着屈原是注重民生的。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離騷)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

像這樣太息掩涕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和他念念不忘君國的思想實在是分不開的，

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國，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樣可以減少艱苦，怎樣可以免掉離散。特別『抽思』的那兩句，尤其表明了他的愛民的心切，他本是打算放下一切朝別處跑的，但他一念到老百姓的受苦受難便只好自己鎮定下來，這是多愷切而又沉痛的一個自述呢！古時候的人每怪屈原不得志於楚國爲什麼不肯跑到別國去發展自己的懷抱，有的又作這樣的解釋，以爲他是楚國的同姓不忍離開自己的祖國，這些都是膚淺之見。一向的人只看到屈原高唱忠君愛國的調子，差不多都忽略了他是位民本思想者，所以對於屈原的態度每每不能了解。像班固那種人竟非難屈原露才揚己，怨刺君上，強非其人，不知道明哲保身，這更是十足地透露了班固自己的可憐性，所謂『蜉蝣撼大樹，多見不自量』了。

屈原在當時的確是可以走的，一國不容即便出走於他國，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很流行的一種風氣。就例如孔夫子罷，他本是宋人而流寓於魯國，在魯國不得志，他便周遊天下走了不少的地方，他的弟子們也是分散在東西南北的。他的再再傳弟子如孟軻，也

由鄒而齊而梁而宋，走到老都還不見休息。荀卿也是由趙而齊而楚，而終老於蘭陵。孟
荀以外的一些遊士說客，那更朝秦暮楚，昨趙今齊，甚至於走到那一國去便勸那一國的
主人去侵略自己的祖國，真真正正是澈底而又澈底，澈到了沒有底的地步。古人曾說
『楚材晉用』，事實上最普遍的是晉材秦用，秦國興國的一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晉人，
如像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等都是。這正表明當時的一般具有見識的人所懷抱的大
一統思想的實踐。周秦諸子同是主張大一統的，但大別也可以分爲兩派，主張德政的人
例如儒家則大抵反對秦國，而主張刑政的人例如法家雜家之流，則每每不擇手段，而傾
向於維護秦國。春秋戰國時代，尤其是戰國末年，中國實在是已經到了『車同軌，書同
文』的地步，只等有一個國家來收獲這政治上的大一統的功績，當時的列國中最有資格
的便是秦楚兩國，劉向有兩句話，『橫則秦帝，縱則楚王』（見『戰國策』），把
當時的情形說得最爲扼要。秦國最佔形勢，居高臨下俯瞰中原，而它的刑政修明，人民
善戰，故最有資格。楚國則地大物博，奄有長江流域淮水流域的一大片膏腴的土地，而

其南方更是無敵地帶足以供其盡量發展，只要刑政能夠修明，也是很有資格。楚國還有一項資格是它的武器的資源不缺乏。金錫的名產地江南吳越爲其所有，而它又是鐵器之開始使用者，荀子的議兵篇言『楚人鐵距宛鉞，慘於蜂螫』，秦昭王也曾說過，楚用鐵劍故其卒強（見史記范雎傳）。這，我們可以知道，是因為有大冶產鐵區在它境內的緣故。在這兒我們更可以了解，屈原在可以走的風氣之下，而偏偏不肯走的另一個原因了。屈原也是主張大一統的人，而且所懷抱的還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統。劉安對於離騷的批評有幾句很扼要的話：『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除掉『下道齊桓』多少有點問題之外，差不多全是儒家理論的體系，其實就是齊桓管仲也是孔子所稱道的人，所謂『微管仲。吾其夷矣』，又『齊桓公正而不謫』。到了孟子才誇張了些，說『仲尼之門羞稱五霸』。

屈原所抱的是德政思想，他是想以德政來讓楚國統一中國，而反對秦國的力征經營。故爾他的眷愛楚國並不是純全因為是父母之邦，並不是因為自己也是楚國的公族在

那兒迷離『舊時代的魂』。我們要知道，他所稱道的『前王』或『前聖』並不是楚國的先公先王，除掉離騷第一句的『帝高陽之苗裔』而外，他絲毫也沒有把楚國的過去的史實來低徊過，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我們且把他所稱道的『前王』和『前聖』索性開一個清單在下邊罷。

(1)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2)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3)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4)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5) 『說操築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以上離騷)

(6)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

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惜誦)

(7)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涉江)

(8)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哀郢)

(9)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

重華不可遷兮，孰知余之從容？』

(10)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以上懷沙)

(11)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思美人)

(12)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離騷)

(13)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庖廚。

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放牛。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14）『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橘頌）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跡。』（悲回風）

（15）『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16）『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

『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以上悲回風）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抽思）

以上一共揭舉了十六項，還有些次一等的賢人我沒有舉出，『天問』篇裏面的我也整個除外了，『遠遊』我認爲是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初稿，也是除外的了。我們看他所稱道的唐堯虞舜禹文武，不正和儒家的古史觀是整個一個系統嗎？稱讚伯夷伊尹，稱讚皋陶彭咸，不也和孔孟是一個脚步嗎？『彭咸』有的說是一個人，又有的說是兩個

人（彭祖與巫咸），與孔子所說的『竊比於我老彭』是一樣，也有的說是一個人，又有的說是兩個人（老彭與彭祖）。假使是一個人則老彭應該就是彭咸，假使是兩個人，則彭祖是共通着的。儒家的古史系統是根據大一統的思想所考案出來的東西，堯舜的存在我們在卜辭和金文裏面並沒有發現，而且在殷周人的訓誥雅頌裏也是沒有的。儒家的一套堯舜觀和道家的一套也不盡相同，例如第八項的被堯舜『以不慈之偽名』的便是莊子，莊子說『堯不慈，舜不孝』，在這兒屈原還是把莊子當成了『讒人』在指責的。儒家把堯舜時代粉飾得很莊嚴，事實上是對於氏族公產社會的烏托邦的景慕。書經上的『帝典』（即偽古文之『堯典』與『舜典』），『皋陶謨』，『禹貢』，『洪範』，這四篇東西，在我看來是子思一派的人假託的。在當時，它本質上是一種革命的，前進的思想，並不是迷戀『舊時代的魂』。屈原完全承繼了這一體系的思想，也正充分地表現着他的革命的，前進的精神，他主張德政，主張選賢舉能，主張大一統，他根本沒有拘泥於楚國一個小圈子裏面的傳統，那是更不能說他是迷戀『舊時代的魂』的。

『有德者必在位』的主張，在他的詩裏面也有，例如：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離騷）

這不是表現得明明白白的嗎？他之所以『繫心懷王』，其實是『願蓀美之可完』（抽思）想他成爲有德的人物，借楚國的地位來作德政式的中國的統一，待他實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他也只好罵他是『壅君』（惜往日）了。他決不是因爲是『一個三閩大夫，對於沒落的公族制，反而寄着衷心的同情感，……企圖改善當時公族專政的制度』。屈原的道德節目也和儒家所理想的別無二致。他是注重在『修己以安人』。例如：

（1）『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2）『耿吾既得此中正。』

(3)『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用夫行媒？』

(4)『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5)『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以上離騷)

(6)『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涉江)

(7)『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8)『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以上抽思)

(9)『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

(10)『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

『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以上懷沙)

(11)『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紛郁郁其應承兮，滿內而外揚。

情與質信可保兮，光居蔽而聞彰。（思美人）

（12）『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橘頌）

像這樣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此外還有無數的香草美人的譬喻，和對於驕傲虛偽之斥責，整個的骨子是以論語學庸裏面的思想在那兒撐持着的。

道德的內涵雖然儘可以因時代而不同，而道德的節目有些是永遠不能變的。譬如仁義這兩個節目，他們的內涵，便是說要怎樣才算得仁，怎樣才算得義，這是因時代而變的，而應該仁，應該義，却永遠不能變。把人當成人就是仁，該做就要做就是義，這永遠不能變。屈原是深深把握着他的時代精神的人，他注重民生，尊崇賢能，企圖以德政作中國之大一統，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澈底的身體力行的人，這就是他的義。像他這樣大仁大義的人物，我覺得實在是可以『參天地』，實在是如他自己所說：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的。他倒不僅是一位革命詩人，更說不上什麼『藝術至上主義者』了。

在這兒我們倒有個問題：便是屈原這樣澈底的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他這思想的源泉是從什麼地方來？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南方的思想和北方的思想是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的區別的。儒家特別代表了北方式的現實主義，道家則代表着南方式的超現實的理想主義。道家中的主要人物莊子是宋人，老子的『道德經』成於環淵之手，是楚人，都是南方的人物。孟子上有一位『爲神農之言』的許行，也是楚國的人物，『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孟子便責備他們說：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據這個故事看來，可以知道當時確有南北學派之分，而陳良是楚國的一位儒家代表，並且是曾經教過幾十年的門徒的。照年代上說來，我覺得屈原說不定就是陳良的弟

子或其私淑弟子。屈原出使過齊國，他和北方的儒者也應該有過直接的接觸，可惜在這一方面沒有資料可以考證。

屈原的關於形而上的思想也深受着儒家的影響。他本質上對於神的存在是懷疑的，『天問』一篇差不多整個是對於『怪力亂神』的疑問。但他在另一方面却仍然保留着天的信奉，例如前面已經舉出過的『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便是良好的例證。或許在他的觀念中的『皇天』或『后皇』，也同儒家一樣，只是一種理念，而不是像殷周時代的乃至如墨家意識中的那種人格神吧。照道理上講來應該是這樣，因為一方面既那樣懷疑，另一方面似乎不應該再有人格神的信奉。不過屈原在這兒却現出了他的矛盾。他的詩裏是有天堂地獄等的描寫的。我們根據司馬遷的記載，把『招魂』認為是屈原的作品。招魂裏面上帝能夠說話，而且還住在天上，天門有九頭怪物把守。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拔木九十些。

豺狼縱目，往來侏侏些。

懸人以俟，投之深淵些。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

這說的是天堂，看這所寫的當然並不是樂園而是十分險惡的地方。假使把天堂寫得十分險惡是屈原的創見，那倒是在把天堂來開玩笑，和天問篇的懷疑思想頗相配合。離騷裏面也說到天堂，而且還把天堂的看門頭兒（『帝關』）罵了一番，這倒是千真萬確的屈原的異想。他叫月神的望舒跟他做先鋒，叫風伯的飛廉跟他做後衛，叫鳳凰去做傳宣使者作通報，乘着風雲，在空中或上或下，或分或合的便走到了天國的門前。他叫天國的門子跟他開門，然而那門子却倚着天門望着他，不跟他開。（大約是要點進門禮吧？）他沒有辦法，天又昏暗起來了，自己在天門前躊躇了一下，他又想往崑崙山上去。回頭再把天門望了一下，不禁流下了淚來，傷心的說連天國中都沒有好人存在。

（『哀高丘之無女』）這思想真是夠奇特的，在二千多年前，無論那一國的著作家，我相信都不會有過這樣奇特的思想。

招魂中又寫到地獄。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約，其角嶷嶷些。

敦脈血拇，逐人驅逐些。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這是中國所固有的描寫地獄的文獻。尚書帝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雖然同叫幽都，但指定為北方區域；和這不同。這些怕是中國古代所流傳下來的僅有的傳說吧。有人說：這是南方古代所接受的印度思想，但恐怕也不盡然。一切宗教性質的東西都是人間世的反映。自氏族社會解體以來，人間有王長者出現，玉衣玉食，作福作威，

反映到天上便成爲上帝與天堂。與王長者爲對的奴隸們或叛逆者，則受苦受難，該燒該殺，再澈底一點，就讓他埋進土裏也逃不掉監獄和禁子。土伯和幽都便是這禁子和監獄的影子。中國古代既有監獄，怎能說不會有地獄呢？不過中國的這種觀念還沒有十分發展，便被後來輸入的印度思想所代替了罷了。

屈原思想對於奴隸制時的神權束縛本來是懷疑的，但他却不惜費力量來描寫天堂地獄，而仍然承認着上帝與土伯的存在。他反對『怪力亂神』，但也謳歌『怪力亂神』，像他的九歌裏面所謳歌的一些神鬼，差不多都是一些怪力亂神的標本。這是不能不說有點矛盾的。這矛盾該得怎樣解釋呢？我看這解釋也很簡單，便是屈原並不是一位純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他在思想上儘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現實主義的儒者，而在藝術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義的詩人。這兩者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格中，老實說是相合無間，並顯不出怎麼的矛盾的，換句話說，便是他的人格和作品把這兩種傾向巧妙地調和了。作爲一個藝術家，和純粹的思想家是不同的，他須得反映多方面的

生活，他須得把思想穿上衣裳，賦以血肉，而使之形象化。特別是在習慣上有許多不合理的東西，我們不知不覺地也還非得把它們沿用不可。譬如我們現代的人，誰都知道地球繞着太陽在轉，然而我們每一個人，在晴天的清晨，總要說：『太陽出來了』，在晚上總要說：『太陽下山了』。誰都知道月亮並沒有盈虧，然而總還是說月圓月缺。心臟只是管血液循環的，我們要表示感情的時候，還是在說，『你不知道我的心』，或者說『很想把心子剖給你看』。這是不合理，是矛盾，然而誰也不覺其不合理，誰也不覺其矛盾。故爾歌德儘管是汎神論者，而他的「浮士德」依然在描寫天堂上帝惡魔；愛因斯坦儘管是相對論的倡導者，而他依然信仰耶穌教。屈原思想和他藝術表現上的矛盾，便只是這樣。合理的思想照例是前進的東西，生活習慣總要落後一點，藝術是生活習慣的反映或批判，它在純粹性上便要受些限制。但是生活習慣到了若干時後也是要跟着前進的，到了那時候還要固執着那種生活習慣，那就成爲思想落後了。屈原所表現的天堂地獄和神鬼等，在北方的詩歌中却幾乎沒有，在這兒也可以得到說明，便是北方的生活習

借在當時已經和南方的大有距離。

中國文化的濫觴，事實上是起於殷代。殷朝的人集居在黃河流域的中部，最早把這一帶地域開化了出來。周人代殷而起，殷人大部分被奴隸化了之後，但還有一部分和他的同盟被壓迫向東南移動，移到了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便是宋徐楚諸國。這些人『筓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算又把這東南夷的舊居開拓出來了，把殷人所創生的文化移植到了南方。所以在周代數百年間，儘管南北敵對，各自發展，而在文化上依然是同母的兄弟。因為無論南北，都是殷人把它開化出來的。但是殷人的氣質和周人的頗有不同。殷人是比較愛好藝術的氏族。殷墟所發掘出的古物，無論是銅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所刻的文字，都富有藝術的風味。又因時代關係，殷人最崇信鬼神，故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帶着超現實的氣韻。周人則是比較現實的氏族。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的。他們承繼了殷人的文化，但加上了自己的現實主義的特徵，在幾百年的陶冶中，於是在黃河流域又形成了一種比較質實的生活習慣。南方的開化既較遲，而又

是殷人的直系的文化傳統，故爾南方的生活習慣較爲原始，然亦較富於藝術味。這便是南方的思想與詩和北方的思想與詩，在風格和內容上，何以頗爲懸異的原故了。我曾作過這樣的比譬：殷人頗像雅典人，周人則頗像斯巴達人。我覺得這個比譬是相當恰當的。中國文化既導源於殷，在周代雖有南北之分，而自秦國兼併六國以後，天下一統，秦人是更質實的民族，於是北方的現實主義的文化便統一了全中國，殷楚人的那種生活情趣便漸漸融化了。

屈原的詩是把民間形式擴大了，而且盡量的採用方言，在春秋戰國的文字革命上遂成了詩歌方面的一個偉大的革命，我在別的機會上已經敘述過好幾次，我在這裏不想再縷述了。不過他這詩歌形式的革命却和他的思想的前進性是合拍的。他是注重民生的，人，乘着奴隸解放的潮流，智識下移的氣運，對於已經僵定了的詩歌，借民間的活生生的生活與言語的灌入，使它復活而蓬勃了起來，這是他的一個偉大的成功，是永遠也不能磨滅的。但可惜他的作品其留存於世的只有詩而無文，這却不免是一件憾事。他是替

楚懷王擬造憲令的人，「惜往日」裏面也說：「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他應該是有許多散文寫出的，而這些散文却没有方法再見了。

總之屈原的思想是前進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儒家思想，在當時，由奴隸制蛻變為封建制的當時，是前進的，我們不好由現代的觀點來指斥為反動，更不好因而說屈原也是思想反動。他和王國維不同，王國維是在封建制已開始蛻變的時候而仍然固執着封建思想。同樣也和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不能並比。屈原因仍不免有些矛盾，但他的矛盾只是在作為藝術家的構思和遣辭上，有意無意地不能將舊有的生活習慣完全擺脫，便是思想是前進的，而方法則不免仍有多少限制。這樣小小的矛盾並不是使他終於懷石自沉的原因。他的自殺的原因倒是由於他的理想和楚國當時的現實相隔太遠，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劇了。請再把白起批評楚國的話摘錄一遍吧。

「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

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這和屈原作品中所斥責的楚國當時的情形，儼如桴鼓之相應。處在這樣的國度裏面，而又身受迫害，且爲倔強到底，感受性比任何人都要銳敏的人，你叫他會怎樣？白起在楚襄王二十一年的拔鄢郢，燒夷陵的兵勢，確實把楚國幾乎逼到了亡國的地步，早就看到了這一步，而終於看到了這一步的詩人屈原，你叫他會怎樣？更何況屈原他是有至高的理想的，他是想以德政來實現中國的大一統，然而好端端的一個楚國却被父子兩代的「壟君」和羣小們弄得一場糊塗，看看那以力征經營的秦國便要以刑政來統一天下，這不是比一個楚國亡了，還要更加令人失望的事嗎？臨到了這樣的一個最大失望，理想家的屈原，你叫他會怎樣？我看除死而外，在他實在是沒有第二條路的。更何況他的死，就和王國維是因爲肺病和經濟逼迫一樣也還可以有別的生理上的原因，讓我們考慮到。我是感覺着屈原的身體，並不十分健康的，過着三十多年的悲劇生活的人，論道理也不會健康得起來。他悲傷憂鬱，長久不能去懷，精神和身體都不能不受損害。他似

乎是有失眠症的人，請看他說：

(1) 『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

終長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 (悲回風)

(2) 『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

(3)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 (以上抽思)

睡了似乎夢也很多，又很怪：

(1)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2)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失杭。』 (惜誦)

還有身體上也確實有痛苦：

『背膺拚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惜誦)

這大約是神經痛，不然便是肋膜炎。至於他有心悸亢進的徵候，在他的詩裏是屢見不一見的。再說離騷那種詩形，九章的大部分也是同樣，是有點『印版語』(Stencoyped

Expression) 的傾向的，這也是精神多少有些異狀時的常見的徵候。我這樣說好像有些侮辱我們的詩人，但這責任是應該由楚國當時的一批羣小來負。而且天才和狂氣，照現代的精神分析家說來，實在是比隣。屈原先生多少有些精神上的偏向，怕也正是使他成功爲了一個偉大的天才的因數罷。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屈原研究

離

騷

今

譯

譯文

我本是古帝高陽氏的後裔，

號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親。

太歲在寅的那一年的正月，

庚寅的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

先父看見了我有這樣的生日，

他便替我取下了相應的美名。

替我取下的大名是叫着正則，

原文（附古韻讀）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東中合韻）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

替我取下的別號是叫着靈均。

字余曰靈均。(真耕合韻)

我的內部既有了這樣的美質，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我的外部又加以美好的裝扮。(註一)

又重之以修能；

我把薜蘿和白芷折取了來呀，

扈江離與薜芷兮，

和秋蘭紐結着做成了個花環。

紉秋蘭以爲佩。(之韻)

我匆忙地就像是在趕路一般。

汨余若將不及兮，

怕的是如箭的光陰棄我飛掉。

恐年歲之不吾與；

我在春天去攀折山上的木蘭，

朝搴阰之木蘭兮，

我在冬天去收攬水邊的青藻。

夕擘洲之宿莽、

金烏和玉兔匆匆地不肯停留，

春天和秋天輪流着在相代替。

想到草和木都時刻地在凋零，

怕的是理想的佳人也蒙衰謝。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你應該趁着年少以自圖修潔，

爲甚總不改變你那樣的路數？

我駕着駿馬正要打算去奔馳，

你來吧，我要爲你在前面引路。

撫壯而棄穢兮，

何不改乎此度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來，吾導夫先路也！（魚部）

古時候曾有過純而粹的三王，

在那時固然是羣芳之所聚會。

昔三后之純粹兮，

固衆芳之所在：

木本的申椒和菌桂也多所戴插，
不僅是把香菌和蕙草紉成環佩。

雜申椒以菌桂兮，
豈惟紉夫蕙草？（之微）

那唐堯和虞舜真是偉大光明，
他們已經是得着了正當軌道。

彼堯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而夏桀和殷紂怎那樣地糊塗，
總愛貪走着捷徑而屢自跌跤。

何桀紂之昌披兮，
夫惟捷徑以窘步？（魚部）

那一批糊塗的人們真苟且儉安，
他們的道路是曖昧而又加狹隘。
我並不怕自己的身子會要遭殃，
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輿要被毀壞。

惟黨人之儉樂兮，
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支部）

我匆匆地在前在後効力奔走，

忽奔走以先後兮，

我想要追趕上先王們的步武。

及前王之踵武；

你既不肯察我胸中的愚誠，

莖不揆余之中情兮，

更反而聽信讒言給我以惱怒。

反信讒而齎怒。

我誠然知道梗直是不能討好，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

但我是忍耐着痛苦不肯拋棄。

忍而不能舍也！

我要請九重的上天做我證人，

指九天以爲正兮；

我惘恍地忠於君王並無它意。

夫惟靈修之故也！（魚部）

在當初你既經是肯和我約定，（註四）

初既與余成言兮，

你奈何翻悔了，又改變了心腸。

後悔遁而有他。

我和我的分離也不怎麼難堪，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只嘆息你的爲人是太沒主張。

傷靈修之數化。（歌辭）

我既經種下了九頃地的春蘭，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我又會栽就了百畝園的秋蕙。

又樹蕙之百畝，

我會把留夷和揭車種了一田，

畦留夷與揭車兮，

更夾雜了些杜衡和芳芷之類。

雜杜衡與芳芷。（之部）

希望着它們的枝葉茂盛起來，

冀枝葉之陵茂兮，

等到了花時我便要加以收割。

願俟時乎吾將刈。

我自己就萎謝了也不算什麼，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可悲的是那羣芳草要遭踐蹋。

哀衆芳之蕪穢。(祭義)

大家都競爭着在以酒食爲徵逐，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貪財好利的心事全然不知滿足。

憑不厭乎求索；

大家都寬恕着自己而猜忌別人，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大家都在鬥着心機而互相嫉毒。

各興心而嫉妒。(魚部)

大家也都在奔狂着奪利爭權，

忽馳騫以追逐兮，

那些都不是我心中之所貪圖。

非余心之所急；

我怕的是老境在漸漸地到來，

老冉冉其將至兮，

我的聲名或許會不能夠建樹。

恐修名之不立。(韓部)

我在春天飲用着木蘭花上的清露，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我在秋天餐食着菊花瓣上的紅霜。

夕餐秋菊之落英，

只要我的精神是美滿而又加頑健，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我就長久地面黃肌瘦呵又有何妨？

長顛頷亦何傷！（陽部）

我掘取了細根來把白芷拴上，

擘木根以結蕙兮，

又穿上了薜荔花落下的花朵，

貫薜荔之落蕊。

我把菌桂削直後再貫以蕙英，

矯菌桂以紉蕙兮，

紉成了瀟洒的花索馥郁婆娑。

索胡繩之纒纒。（歌部）

我本虔敬地在效法古代的賢人，

謇吾法夫前修兮，

我的環佩本不爲世俗之所喜歡；

非世俗之所服；

雖不能和今世的人們道合志同，
而我所願效法的是殷代的彭咸。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之部）

我哀憐那人民的生涯多麼艱苦，

哀民生之多艱兮，

我長太息地禁不住要灑雪眼淚。

長太息以掩涕兮

我雖然是愛好修潔而自製花環，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

在清早做成，晚上便已被人折毀。（註五）

謇朝諝而夕替。（原部）

不怕他就毀壞了我秋蕙的花環，

既替余以蕙纒兮，

我又要繼續着用白芷花來替代。

又申之以擘蘭。

說到頭是我自己的情願心甘，

亦余心之所善兮，

縱使是死上九回我也不肯悔改。

雖九死其猶未悔！（之部）

我怨恨你王長者的真是荒唐，

你始終是不體貼人民的憂心。

你周圍的侍女嫉妬我的丰姿，

造出謠言來說我是本來好淫。

固然是糊塗的人們善於取巧，

不守一定的規矩而任意胡爲。

拋卻了一定的準繩只圖牽就，

競爭着在依阿取悅以爲常規。

我憂鬱，我不安，我感受着孤獨，

怨靈修之浩蕩兮，

終不察夫民心；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侵部）

固時俗之工巧兮，

偃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爲度。（魚部）

怵鬱悒余侘傺兮，

我孤獨地遭受着今世的困窮。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我就使淹然死去而魂離魄散，

甯溘死以流亡兮。

也決不肯同乎流俗，屈節卑躬。

余不忍爲此態也。（之部）

鷹和隼不能夠和凡鳥同羣，

鸞鳥之不羣兮，

原本是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自前世而固然。

那有方和圓能夠互相通融，

何方圓之能周兮？

那有曲和直能夠一概相量。

夫孰異道而相安？（元部）

我委曲着情懷，抑制着意氣，

屈心而抑志兮，

我忍受着譴責，排遣着羞恥，

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之志而死忠貞之節，

伏清白以死直兮。

本是前代的聖人之所稱許。

固前聖之所厚。（侯部）

我失悔我的路向是根本走錯，

悔相道之不察兮，

我停頓着又打算要路折回頭，

延佇乎吾將反；

把我的車馬掉過來走向歸路，

回朕車以復路兮，

要趁着這迷途未遠趕快罷休。

及行迷之未遠。（元部）

把馬鬱解了，讓它在蘭皋逍遙，

步余馬于蘭皋兮，

讓它在椒丘上馳驅，暫時休息，

馳椒丘且焉止息。

我不想再上前去以遭受禍殃，

進不入以離尤兮，

我要退回故鄉修理我的舊服。

退將復修吾初服。（之部）

我要把碧綠的荷葉裁成上衣，

製芰荷以爲衣兮，

我要把潔白的荷花綴成下裳。

集芙蓉以爲裳。

沒人知道我也就讓他抹殺罷，

不吾知其亦已兮，

只要我的內心是真正地芬芳。

苟余情其信芳！（附註）

要把頭上的冠戴加得高而又高，

高余冠之岌岌兮，

要把項下的環佩增得長而又長，

長余佩之陸離；

芳香和光澤縱使會被人混淆呀，

芳與澤其雜糅兮，

只我這清白的精神是絲毫無恙。

惟昭質其猶未虧。（附註）

我忽然又回過頭來放開眼界，

忽反顧以遊目兮，

打算往東西南北去四處觀光。

將往觀乎四荒。

我的花環是參差而又多趣呀，

馥郁的花氣會向四方而遠颺。

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陽部）

世上的人們任隨他各有所好，

而我的習慣是專於愛好修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

余獨好修以爲恆；（註二〇）

就把我車裂了我也不肯變更，

我的心難道是避怕受人威脅？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蒸部）

我的女伴她慇懃地替我關心，（註六）

她媿嫵而又迴環地勸戒着我。

女嬃之嬋媛兮，

申申其詈予；

她說道：『鯀是太直辟不顧性命，

終竟在羽山下遭受了慘殺之禍。

曰：『鯀綽直以亡身兮，

終然天平羽之野。（魚部）

「你爲甚麼總是要孤高而又潔癖，

偏偏的一個人有着這樣的奇裝？

蹊蹊，王芻和臬耳正是當道時節，

你卻與衆不同地要說它們不香。

「汝何博譽而好修兮，

紛獨有此媿節？

賈棻施以盈室兮，

判獨離而不服！（之瑟）

「人衆是不能夠家諭而以戶曉呵，

有誰人能夠了解得我們的內心？（註七）

人間世都是在成羣而又結夥呀，

你爲甚麼總孤另另地不表同情？」

「衆不可戶說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莞獨而不予聽？」（之瑟）

我依據着先聖的理法節制性情，

依前聖以節中兮，

有了這樣的遭遇不禁悲憤眞胸。

嚼憑心而歷茲。

渡過了沅水和湘水我走向南方，

濟沅湘以南征兮，

我走去向着重華表訴我的寸衷。

就重華而陳辭：（之部）

『夏啓從天上得到了九辯與九歌，

『啓九辯與九歌兮，

在艷陽時分他歡樂着，自行放縱。（諱入）

夏康娛以自縱。

毫無深遠的謀慮以作未雨綢繆，

不顧難以圖後兮，

他的兄弟五觀便和他生了內訌。（註九）

五子用夫家巷。（東部）

『有窮氏的后羿淫於遊觀而好田獵，

『羿淫遊以佚畋兮，

他所歡喜的是在山野外射殺封狐。

又好射夫封狐：

本來是淫亂之徒該當得沒有結果，

罔亂流其鮮終兮，

他的相臣寒泥更佔取了他的妻孥。

泥又貪夫厥家。(魚部)

寒泥的兒子過濫又肆行霸道，

澆身被服強圍兮，

放縱着自己的情慾不能忍耐，

縱欲而不忍；

他每日裏歡樂得忘乎其形，

日康娛而自忘兮，

終久又失掉了他自己的腦袋。

厥首用夫顛隕。(文部)

「夏桀王他也始終是不近人情，

「夏桀之常違兮，

到頭來是竄走到南巢而野死。

乃遂焉而逢殃。

紂王把自己的忠良弄成肉醬，

后辛之菹醢兮，

殷朝的王位也因而無法維持。

殷宗用而不長。(陽部)

「商湯和夏禹都謹嚴而又敬戒，

周的先世講求理法也沒差池，

在政治上是舉用賢者和能者，

遵守着一定的規矩沒有偏畸。

「湯禹嚴而祇敬兮，

周論道而莫差；

舉賢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歌部）

「主宰一切的上帝他公道無私，

他要看到了有德行的才能幫助。

「皇天無私阿兮，

覽民德焉錯輔。

只有那德行高邁的聖人和賢士，

才能夠使得四海之濱成爲樂土。

夫惟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魚部）

「既經考察了前王而又觀省後代，

我省察得人生的路徑十分詳明。

「瞻前而顧後兮，

相觀民之計極。

不會有過不義的人而可以信用，

不會有過不善的事而可以服膺。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我縱使是身臨絕境而喪失性命，

看到自己的初心我也並不翻悔。

「陆余身而危死兮，

覽余初其猶未悔。

不會問鑿孔的方圓而只求正柄，

古代的賢人正因此而遭了趙醢。」

不量鑿而正柄兮，

固前修以趙醢。」（之部）

我是連連地嘆息着而又嗚咽，

哀憐我生下地來沒逢着良辰。

曾歎歎余鬱邑兮，

哀朕時之不當；

我提起柔軟的花環揩雪眼淚，

我的眼淚滾滾地濡溼了衣襟。

攬茹蕙以掩涕兮，

濡余襟之浪浪。（陽部）

我跪在自己的衣腳上訴了衷情，

跪敷衽以陳辭兮，

我的中心耿耿地既得到了穩定。

耿吾既得此中正。

我要以鳳凰爲車而以玉蚪爲馬，

馳玉蚪以乘鸞兮，

飄忽地御着長風向那天上旅行。

濫埃風余上征。（排韻）

我清晨才打從那蒼梧之野動身，

朝發軔於蒼梧兮，

我晚上便落到崑崙山上的縣圃。

夕余至乎縣圃。

我想在這神靈的區域勾留片時，

欲少留此靈瑣兮，

無奈匆匆的日輪看看便要入暮。

日忽忽其將暮。

我便叫日御的羲和要慢慢地駕駛，

吾令羲和弭節兮，

就望見日將入的崦嵫也沒用追促，
我們的途程是十分長遠而又長遠，
我要到上天下地去尋求我的所悅。

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魚部）

且讓我的玉蚪就在咸池飲水，
且讓我的乘風就在扶桑休息，（註一〇）
折取若木的極枝來敲打日頭，
我暫時留在這兒逍遙而躑躅。

飲余馬於咸池兮，
總余轡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陽部）

想遣月御的望舒替我做著前驅，
想遣風伯的飛廉替我做著後衛，
想遣天鷄的鸞鳳替我作着鼓吹——

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
鸞鳳爲余先戒兮，

雷師走來告訴道：一切未曾準備。（註一一）

雷師告余以「未具」。（後部）

我便令我的乘鳳展翅飛騰，

吾令鳳鳥飛騰兮，

即使入了夜境也無須停頓，

繼之以日夜；

飄風聚集着都在恐後爭先，

飄風屯其相離兮，

率領着雲和霓來表示歡迎。

率雲霓而來御。

我們是蓬蓬勃勃地時離時合，

紛總總其離合兮。

我們是光輝燦爛地或下或上。

斑陸離其上下。

我叫那天國的門子替我開門，

吾令帝開關兮，

他才倚着天門只是把我望望。

倚閭闔而望予。

時辰是昏朦地快到末日的
光景，
我紐結着所佩的幽蘭不能移步。
人間世是這樣混濁而不別賢愚，
總愛抹殺別人的美德而生嫉妒。

時曖曖其將罷兮，
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

等待到天明時我又要渡過白水，
我要登上那閩風山頂繫我玉蚪。
我忽然地又回轉頭去流起淚來，
我可憐這天國中也無美女可求。（註二）

朝吾將濟于白水分，
登閩風而紉馬。
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魚部）

我飄忽地來到了這天國的門前，
我攀折了瓊枝來插上我的蘭佩。

溘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

趁着這瓊枝上的瑤花還未飄零，

及榮華之未落兮，

我要到下方去送給可愛的香閨。

相下女之可詒。

雲師的豐隆，我叫他駕着雲彩，

吾令豐隆乘雲兮

爲我去找尋宓妃的住址所在。

求宓妃之所在。

我把蘭佩解下來拜託了蹇修，

解佩纒以結言兮，

我請他代表着我去向她求愛。

吾令蹇修以爲理。（之部）

她開始總是含糊地欲允不允，

紛總總其離合兮，

忽爾問又乖違了全不肯贊成。

忽緯繹其難遷。

她晚上回家時是在窮石過夜，

夕歸次于窮石兮，

她清早梳頭時是在消盤堆雲。

朝濯髮于消盤。（元部）

她只圖保存着貌美不肯謙恭，

保厥美以驕傲兮，

整天價都歡樂着在外面遨遊。

日康娛以淫遊；

面貌雖誠然嬌好而禮節全差，

雖信美而無禮兮，

我要丟掉她，慎鄭地再作別求。

來違棄而改求。（幽部）

我在天空中觀遍了四極八荒，

覽相觀於四極兮，

我觀遍了又然後回到這下界。

周流乎天余乃下。

我望見了有娥氏的佳人簡狄，

望瑤臺之偃蹇兮，

她居住在那巍峨的一座瑤臺。

見有娥之妣女。（魚部）

我吩咐鳩鳥，叫她去替我做媒，

吾令鳩爲媒兮，

鳩鳥她告訴我說道，那可不對。

鳩告余以『不好』。

有雄的斑鳩本來是善於訴苦，

雄鳩之鳴逝兮，

但我又嫌惡他，覺得未免多嘴。

余猶惡其佻巧。（幽部）

我心裏躊躇着而又狐疑呀，

心猶豫而狐疑兮，

我想要自己去也覺得不妥。

欲自適而不可。

玄鳥的鳳凰已把禮物送她。（註一四）

鳳凰既受詒兮，

我恐怕高辛氏是快過了我。

恐高辛之先我。（歌部）

想往遠方去但又無可投靠，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我暫且流浪着在四處逍遙。

聊浮遊以逍遙。

趁少康還沒有結婚的時節，

及少康之未家兮，

還留下有虞氏的兩位阿嬌。

留有虞之二姚。(宵部)

但提親的既不行而媒人又笨，(註一五)

理弱而媒拙兮，

我恐怕這次的求婚也是不穩；

恐導言之不固；

人間世是混濁而嫉妒賢能呀，

世溷濁而嫉賢兮，

喜歡的隱人善處而揚人惡聲。

好蔽美而稱惡。

佳麗的香閨既深邃而難於覬覦，

閨中既以邃遠兮，

你聰明的人主又始終不肯醒悟。

哲王又不悟：

我一肚子的衷情真無處可訴呀，

懷朕情而不發兮，

我那能夠忍耐得就這樣地死去！

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魚部)

我找來了靈草的瓊茅和些細竹，

索瓊茅以筵筮兮，

我請求了女巫的靈氛爲我占卜。

命靈氛爲余占之。

她說道：「男才女貌本是天所配成。

曰：「兩美其必合兮，

那兒有真正的美人而沒人追逐？」

孰信修而莫心之？（《離騷》（註一六）

「你請寬懷些呀請想到九州的廣大，

「思九州之博大兮，

何必一定要限於這兒才有女娃？」

豈惟是其有女？

你請努力着朝四方法不要逡巡，

曰（爰）勉遠逝而無疑兮，

又那有懷春的女子會把你丟下？」

孰求美而釋汝？

「天地間那兒會沒有香草呢？」

「何所獨無芳草兮？」

你爲什麼一定要念着故鄉？」

爾何懷乎故宇？」

這故鄉是黑暗而又昏聩呀，
誰能夠辨別出我們的短長？

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魚部）

「人們的好惡本沒有什麼不同，

「民好惡其不同兮？

只有那一批人們是特別出衆。

惟此黨人其獨異。

他們都把些野蒿來帶滿腰間，

戶服艾以盈腰兮，

還要說馥郁的幽蘭不可佩用。

謂幽蘭其不可佩。（之部）

「連草木的好壞都還不能辨清，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說到美玉的臧否又豈能識相？

豈理美之能當？

把糞土來充滿了自己的纓包，

蘇糞壤以充幃兮，

還要說申椒是真的一點也不香。」

謂申椒其不芳。」（幽部）

我打算要聽從這靈氛的吉占，

但我心裏又躊躇着不能決定。

聽說是巫咸將要在晚間下凡，

我懷着椒香和精米等他來臨。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

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之部）

天上的百神縹渺地從天而下，

九嶷的神女繽紛地前往迎迓。

輝煌煌地發出了無限的靈光，

巫咸他又告訴了我一批好話。

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嶷續其並迓。

皇剡剡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魚部）

他說道：『你該努力到四方去跋涉，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去追求出意氣相投的你的同志。

商湯和夏禹都虔誠地求過賢臣，

伊尹和皋陶便際遇着君臣共濟。

「只要你自己的存心真好修潔，

又何必一定要有人來做媒介？

傳說他曾經在傅巖版築爲傭，

武丁用了他並沒存絲毫芥蒂。

「呂望在朝歌的市中使用屠刀，

遇着周文王便拜他做了師傅。

甯戚在放牛時扣角而作商歌，

求矩矱之所同。（註三三）

湯禹嚴而求合兮：

摯咎錄而能調。（東幽合韻）

「苟中情其好修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

說操作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之部）

「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

遇着齊桓公便聘他做了大夫。

齊桓聞以該輔。(魚部)

「要趁着這歲華還沒有遲暮，

「及年歲之未晏兮，

要趁着這季節也還沒有蕭條，

時亦猶其未央；

怕的是一聽到伯勞鳥的叫聲，

恐鶉鴉之先鳴兮，

一切的花和草都要爲之香消。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陽部)

「你那瓊枝的環佩真是美滿，

「何瓊佩之偃蹇兮，

怎奈得人衆糊塗不能相識。

衆愛然而蔽之？

那批先生是完全不講誠信，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怕要出於嫉妒前來毀折。

恐嫉妒而折之。」(祭部)

時俗是紛紛地變換無常呀，

我在此又那能夠久於停留？

幽蘭和白芷都失掉了芬芳，

溪蓀和蕙草都變成了蒼茅。

時續紛以變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爲茅。（幽部）

爲什麼往日的這些香草，

到今天直成了荒蒿野艾？

這難道還有甚別的理由？

只因爲它們是不肯自愛！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祭部）

我以爲蘭本來是萬分的可靠，

誰知它名實不符而虛有其表！

余以蘭爲可恃兮，

羌無實而容長；

拋棄了自己的美質隨俗取容，

它真真是辱沒了一般的香草！

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陽部）

椒，他專一的取媚而妄自誇大，

本來是茱萸也想要充實香包，

既經是不自珍重而力求佞倖，

縱使還有點香又有什麼可寶。

椒專佞以慢愒兮，

檜又欲充夫佩幃；

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祇？（脂部）

時俗本來是愛隨波而逐流，

誰又能保持得不生出變化？

看到椒和蘭都變成了這般，

揭車和江離更無須乎多話。

固時俗之從流兮，

又孰能無變化？

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况揭車與江離？（缺部）

只有我戴的花環至可寶貴，

美質雖被蔑視而遭遇可悲；

花的芳香勃勃地難以消逝，

花的芳香直到今還未衰微。

惟茲佩之可貴兮，

委厥美而歷茲，（註三）

芳菲菲而難虧兮，

芬至今猶未沫。（之脂合韻）

保持着沖和的態度以自歡娛，

我姑且向四處飄流尋求美女。

要趁着我這環佩還很有馨香，

我要四處去尋求呵上天下地。

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遊而求女。

及余飾之方壯兮，

周流觀乎上下。（魚部）

靈氛已把協吉的古辭向我告訴，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選定了好的期日我要走向遠方。

騰吉日乎吾將行。

把瓊樹的嫩枝折來做我的路菜，

折瓊枝以爲羞兮。

把美玉的細屑磨來做我的乾糧。

精瓊糜以爲糗。(陽部)

爲我駕上神速的八尺高的龍馬，(註一七)

爲余駕飛龍兮，

把瓊瑤和象齒裝飾着我的乘輿。

雜瑤象以爲車。

離心離德的人們那有方法同流？

何離心之可同兮？

我要飄泊到遠方去離羣而索居。

吾將遠逝以自疏。(魚部)

我且把我的路徑轉向着崑崙，

遭吾道夫崑崙兮，

離別了故鄉去作天涯的羈旅，

路修遠以周流。

高標着雲霓的旗幟映日生輝，

揚雲霓之旒旆兮，

搖動着玉製的鸞鈴和音欽其。

鳴玉鸞之啾啾。(幽部)

我清早打從天漢的渡口起身，

朝發軔於天津兮，

我晚間便達到了西方的邊極。

夕余至乎西極。

鳳凰飛來續紛地繞我的旌旗，

鳳凰紛其承旂兮，

都高高地翺翔着而威儀翼翼。

高翺翔之翼翼。(之部)

我忽然間走到了西極的流沙，

忽吾行此流沙兮，

沿着這赤水我紆徐地徙倚，

遵赤水而容與；

我麾使着蛟龍爲我駕道橋樑，

麾蛟龍使梁津兮，

招呼着白帝快把我渡過河去。

詔西皇使涉予。(魚部)

道路既長遠而又十分崎嶇，

路修遠以多艱兮，

我只好叫從車們等待。

騰衆車使徑待。

路繞着不周山再向左而轉，

路不周以左轉兮，

不走到西海邊許決不回來。

指西海以爲期。（之部）

我的車從聚集着有一千多乘，

屯余車其千乘兮，

品齊着玉製的輪子並轡而馳。

齊玉軼而並馳；

各駕着八頭的駿馬蹻蹻如龍，

駕八龍之蜿蜿兮，

載着有雲彩的旗幟隨風委移。

載雲旗之委移。（歌部）

我自己按抑着壯志，弭轡徐行，

抑志而弭節兮，

讓迢迢的精神在清虛中馳騁。

神高馳之邈邈。

演奏着夏啓的九歌，舞着九韶，（註一八）
暫時地借着辰光以舉行餘興。

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偷樂。 管部

在皇天的光耀中昇騰的時候，

陟陛皇之赫戲兮，

忽然間又看見了下界的故丘。

忽臨睨夫舊鄉；

我的御者生悲，馬也開始戀棧，

僕夫悲，余馬懷兮，

只是低頭回顧，不肯再往前走。

蜷局顧而不行。（陽部）

（尾聲）（註十九）

辭曰

算了罷！

「已矣哉！

國裏沒有人，沒有人能把我理解，

國無人，莫吾知兮，

我又何必一定要思念着鄉關？

又何懷乎故都？

理想的政治既沒人可以協力施行，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我要死了去依就那殷代的彭咸。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魚部)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

註一 此句原文「又重之以修能」，能字是態字的省略，「內美」與「修態」爲對，有內又有外，故有「重」。

註二 這兩句在原文是「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木蘭在春天開花，宿莽是冬天的青草，故知詩人係以朝夕喻歲時。又下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亦同此例。既同例，舊以爲山名，非是。

註三 此句今行王逸本爲「不撫壯而棄穢」，註云「文選無不字」。今從文選本。

註四 此句之前今行本有「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興祖補注云「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日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案出抽思)與此語同」。今案洪說極是，當是王逸以後人注抽思二語於側，傳寫誤爲正文，因求文體一致與合韻之故，故加一「兮」字，而改「回畔」爲「改路」也。路字與上二韻舍故相協。二句本無，故今譯本刪去之。

註五 此句原文爲「審朝諱而夕昏」諱字頗費解，舊解亦難信從，今作爲卒字解，言卒業也。

註六 原文爲「女須之嬋媛」，女須舊以爲人名，或說爲屈原姊，或說爲屈原妹，均不確。今姑譯爲「女伴」，疑是屈原之侍女。

註七 此句原文爲「孰云察余之中情」，余字在此當解作複數。古人用代名詞，單複數之形每無別，如詩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我均是我們。此句余字亦正是我們。前人坐此字不得其解，以此節爲屈原之語非是。

註八 此二句原文爲「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即啓）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天間亦云「啓棘賓帝（原誤爲商），九辯九歌」，故此譯作自天上得來。又「夏康娛以自縱」句，舊以「夏康」通讀爲夏之太康，以下文「日康娛而自忘」「日康娛以遨遊」等句法例之，知實出於誤會。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淫溢靡樂，野于飲食，……滂濁于酒，偷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所道者卽此事。武觀卽書逸篇五子之歌（今存者乃標頤偽本），亦卽本節所出之五子。國語楚語士嬀曰「啓有五觀」。五武音同字通，實一人，非五人。五子誤爲五人，其事甚古。周書晉書解「昔在啓（原誤爲殷，今正）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

無正，用晉興作亂，遂凶厥國」。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均
以五子爲五人，且以爲啓子。揆其所由，蓋卽出於誤讀離騷此節之故，以「夏康」既誤於前，而
「五子」復誤於後也。（今本竹書紀年詳紀武觀事，然係雜採諸書而杜撰出之，不足信。可參看土
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註九 此句原作「五子用失乎家巷」，王念孫謂失字爲衍文，並讀巷爲孟子「那與魯國」之國，謂「家
巷」卽內訌（見說書雜誌餘下），均至確。余意失字實夫字之譌，蓋古本一作夫，一作乎，作夫者
譌爲失，後錄書者遂合二本而成爲此語。

註一〇 此二句原文只言馬言響，然上文有「馴玉蚪以乘鸞」之語，知所謂馬卽玉蚪，響卽鳳凰。

註一一 原句爲「雷師告余以未具」，舊解爲「嚴裝未具」，余意當是所需要之月御風伯鸞皇等未能準備
之意。

註一二 原文爲「哀高丘，無女」，高丘指天國附近之處。因上言帝閨不爲開門，故此忽然流涕，覺天國
中亦有炎涼也。

註一三 此言宓妃與后羿通淫。左傳襄四年「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天問篇「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洛嫫？」洛嫫卽窈窕。

註一四 原句爲「鳳凰旣受詒」，以上文案之賀卽玄鳥傳說。天問篇「蒲狄在壘佻何宜？玄鳥致詒女何

嘉？」九章思美人「高辛之靈姦兮遭玄鳥而致詒」。玄鳥致詒卽鳳凰受詒，受授者，詒賂通，知

古代傳說中之玄鳥實是鳳凰也。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注家以玄鳥爲燕，乃後來之轉

註一五 原句爲「理弱而媒拙」。九章抽思「理弱而媒不通」，又思美人「令赫茲以爲理……因芙蓉而爲

媒」，均理與媒對文。本文上有「吾令蹇修以爲理」句與「吾令鳩爲媒」語例辭意均相類。蓋古

者提媒人與媒介人有別（今世習俗亦每如是），提媒人謂之「理」也。

註一六 此句原爲「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慕」字意雖通，與上句占字亦不合韻。余以爲當是

「其心」二字誤合而爲一者也。心者任也，愛慕之極也。詩所謂「心乎愛矣」，又「中心藏之」。

又靈氣乃女巫名，知必爲女巫者以九歌言靈多言女飾故。

註一七 「爲余駕飛龍」，龍乃馬名，馬八尺以上爲龍，爾雅釋獸作駘。知必爲馬名者，下文言「僕夫

註一八 「奏九歌而舞韶」，九歌乃啓樂，見上（註八）。韶卽九辯，乃啓舞。大荒西經「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卽啓）焉（爰）得始歌九招」，郭璞註引紀年「夏后開舞九招。」

註一九 原文爲「亂曰」，亂卽是辭之古字，古金文，多用爲司，以治爲義。凡古書中亂字含相反之治義者均是本字本義。其相反之字當作「亂」，後世失傳，又誤以「亂」字爲之，而「亂」之本義遂致完全顛倒。文末繫以「辭曰」以作尾聲，與抽思之「少歌曰」「唱曰」義例相同，亦正楚辭之名之所由得。此義二千餘年後始得揭發，亦一快事。

註二〇 恆字今本作常，乃漢人避文帝諱所改。

註二一 同與調乃東幽合韻。段玉裁云「調讀如禱。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以韻同字，東方朔七諫以韻同字，皆讀如重。此古合韻也。」（六書音韻表四，第九部調字註）

註二二 茲沫乃之脂合韻，段玉裁已言之，見六書音韻表四，第一部「古合韻」沫字下。

（附白）本篇譯就，復將原文附於下方，以便讀者對照。原文乃中國至和諧之韻文，譯爲今語，實多勉強而難於討好。然余竊然爲此者，凡古代韻文，於字法句法多所省略，吾輩讀之，每陶醉於其音韻之鏗鏘，如接聆音樂而多不明其義。今以今言譯之，於名詞代名詞之單複數，動詞之時詞等

三致意焉，則古文之節段與意境有不煩多辭而豁然自呈者。本篇之譯述亦略略有此功效。讀者
請視爲余之韻語疏注可耳。

屈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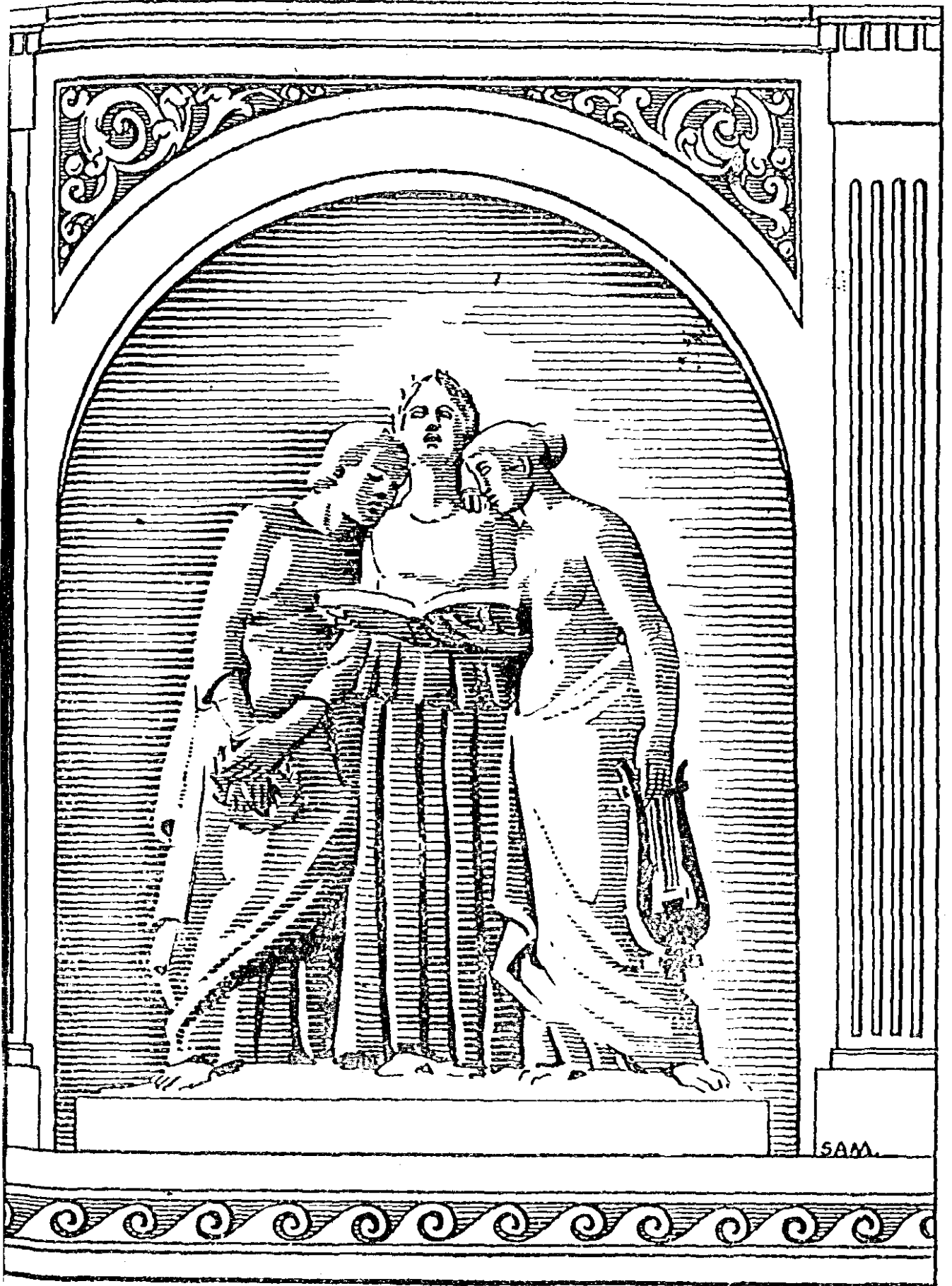
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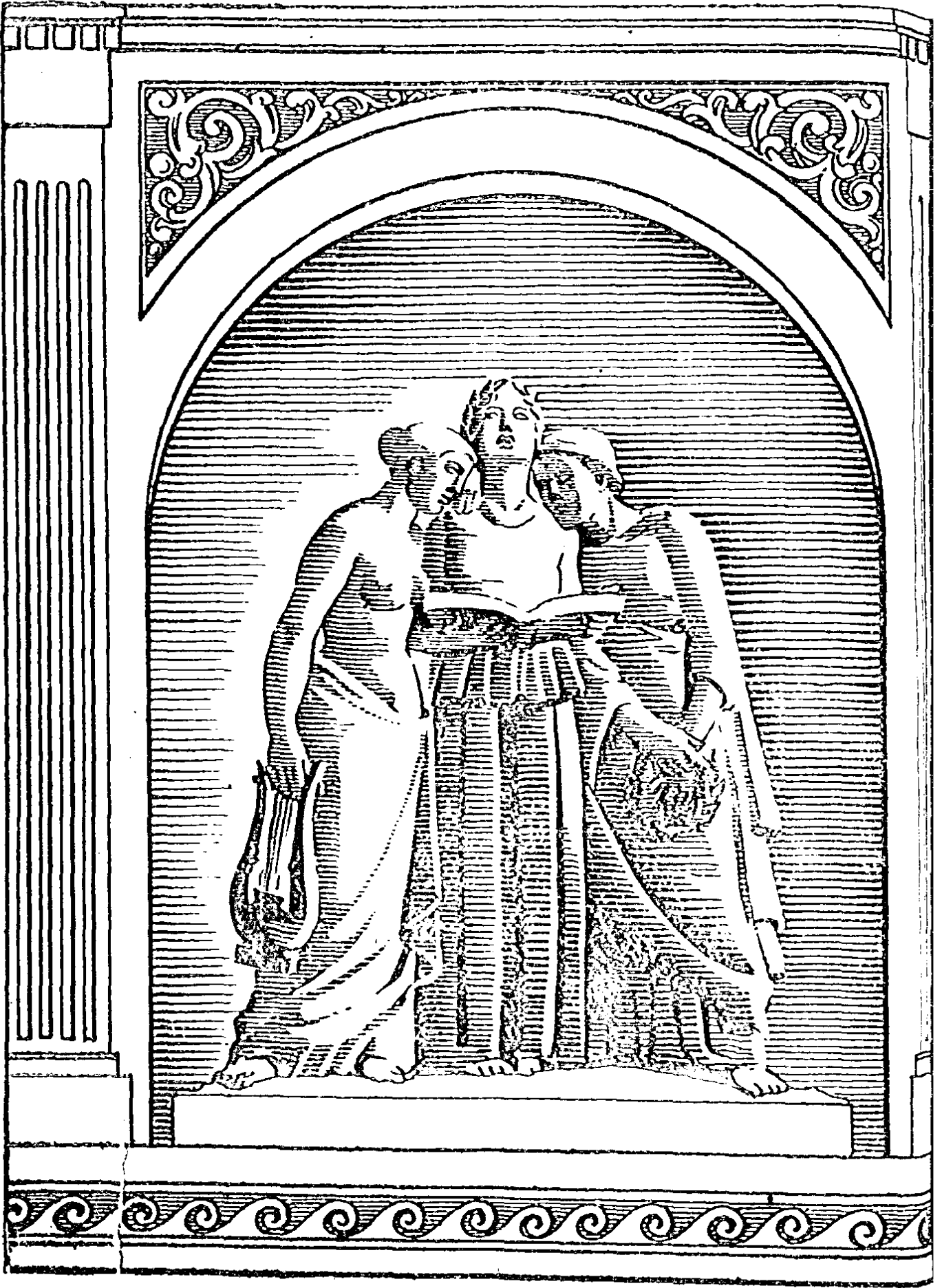
這個小冊子裏面所收的幾篇東西，並不是一時完成的。第一篇的『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曾以『屈原』名義由開明書店出版，現在加以刪改而成定稿。第二篇『屈原時代』，曾收入『沫若近著』，今亦大加改削。第三篇『屈原思想』，是今年寫的，在此足以補充前兩篇所論的不足。『離騷』的譯文雖亦舊業，但也是大大地經過改削的。我對於屈原的整個看法，大抵就包括在這個小冊子裏面了。

三十一年五月五日

郭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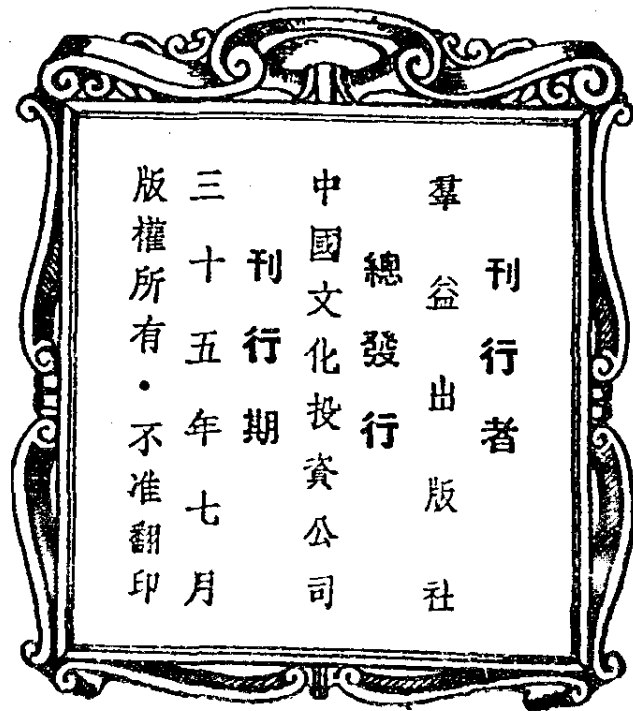








究研原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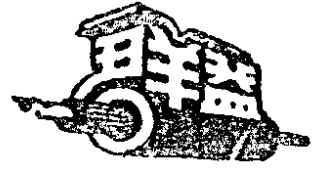
2 (5001-7000) 羣(1003)

郭沫若文集

第一輯第三冊

三十五年七月

梁琛設計裝幀



3
5-2